

陳獨秀選集

陈独秀选集

胡 明 编选



陳 世 秀 像

目 录

编者前言

陈独秀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	胡明(1)
安徽爱国会演说.....	(1)
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	(5)
敬告青年	(10)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17)
今日之教育方针	(21)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28)
新青年	(33)
宪法与孔教	(37)
再论孔教问题	(43)
致胡适	(47)
文学革命论	(48)
答淮山逸民(道德)	(52)
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53)
答胡子承(思想革新)	(54)
近代西洋教育	(55)
答陶孟和(世界语)	(60)

人生真义	(62)
有鬼论质疑	(65)
学术独立	(67)
偶像破坏论	(68)
《每周评论》发刊词	(71)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72)
除三害	(74)
旧党的罪恶	(76)
研究室与监狱	(77)
北京市民宣言	(78)
《新青年》宣言	(79)
法律与言论自由	(82)
调和论与旧道德	(84)
留学生	(88)
实行民治的基础	(89)
新教育的精神.....	(101)
教育缺点.....	(104)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108)
陈独秀最近之演说.....	(115)
谈政治.....	(117)
《共产党》月刊短言.....	(128)
主义与努力.....	(130)
提高与普及.....	(131)
社会主义批评.....	(132)
《红楼梦》新叙.....	(148)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150)

告劳动.....	(153)
卑之无甚高论.....	(155)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157)
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159)
平民教育.....	(161)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162)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164)
马克思学说.....	(170)
《独秀文存》自序.....	(182)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	(183)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185)
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	(187)
《科学与人生观》序.....	(188)
精神生活 东方文化.....	(196)
国学.....	(199)
泰戈尔与东方文化.....	(200)
留美学生.....	(202)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203)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206)
列宁与中国.....	(208)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212)
十月革命与东方.....	(213)
移步换形的骗术.....	(217)
致胡适.....	(218)
孔子与中国.....	(220)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234)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236)
民族野心.....	(243)
说老实话.....	(247)
资本主义在中国.....	(249)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252)
给托洛茨基的信.....	(258)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262)
我的根本意见.....	(265)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270)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279)
陈独秀著作年表.....	(284)

编者前言

陈独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一生勤于著述,文学遗产十分丰厚,在思想哲学、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诸多方面都发表过大量文章。收入本选集的78篇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本册所选皆是陈独秀个人的学术著作,凡他代表中共中央组织起草或发表的宣言、报告、政论、指示、决议均不收,他参预托派活动期间的政治言论也大都不收;没有公开发表的文字音韵类著述也不收。收入选集的文章都保持原貌,只对原文排印中个别明显的错字、漏字和标点断句作了必要的改正和增补。原文中的外国人名都改用目前通行的译法。

陈独秀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人，字仲甫，号实庵。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重要人物，他又是一位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探索研究上有过重大贡献又提供巨大教训的复杂人物。他一生著作丰富，这里只是从他一千六百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一小部分，集中代表了陈独秀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上有影响的思考成果和学术意见。

陈独秀的一生积极参与社会科学探索和社会政治实践。他曾苦读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而考上秀才，还参加过江南乡试。1897年他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由于反清言论文章而被官厅追捕。1903年8月他在上海与章士钊、苏曼殊创办《民国日日报》，鼓吹推翻满清王朝，建立立宪政府。1904年他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1914年在日本东京与章士钊、谷钟秀等创办《甲寅》月刊。1915年回国后创办赫赫有名的《新青年》。“五四”前夕他又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5至8月他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继而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15日创办《劳动界》，在工人阶级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工人运动。11月7日又创办《共产党人月刊》，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内部刊物，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共产党知识。他四次东渡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民主的洗礼，他在他创办、主办的报刊上积极提倡科学进步、民主自由、人权尊严、社会进化，为反对黑暗的社会制度，宣传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严肃的理论探索和勇猛的实践斗争，这为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进而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独秀的一生在思想哲学、理论宗旨上有过多次变化，对他学术成就的全面估价不很容易，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陈独秀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辉煌、贡献最积极的便是五四时期主办《新青年》杂志。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就办起了《新青年》（第一卷称《青年杂志》），在当时死气沉沉、风雨如晦的社会政治空气下开始了开创性而富于成效的启蒙工作，在前一辈思想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等沉寂之后异军突起，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一颗“明星”。

陈独秀在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舞台一出场就把两只眼睛盯住了中国的青年，他满怀热情地把改造中国、更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作为《新青年》的第一卷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要实践这社会改革的所谓“三事”，关键在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为新青年的“新”定出六条标准：“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

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亟盼青年一代在新的时代标准前勇敢地做出抉择，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造中国的大事业中去。二卷一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做了一篇叫做《新青年》的文章，又以“新”为号召，号召青年都奋发做“新”青年，而不要停留和追慕已经透出阵阵尸臭的“旧”青年的尾列。并为“新”青年提出两点忠告：“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数十年寒暑耳，乐天者荡，厌世者偷，唯知于此可贵之数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者得之。准此以行，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岁不我与，时不再来，计功之期，屈指可俟。一切未来之责任，毕生之光荣，又皆又于此数十寒暑中之青年时代十数寒暑间植其大本。” 追求人生幸福乃当然之天则，但“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为最重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信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 陈独秀又进而指出：“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唯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

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唯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龌龊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因其精神上之龌龊下流，与彼腐败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这一篇话可以说是他办《新青年》的原本宗旨。这些言论在当时无疑是一声春雷，对举国青年之心发生了狂飙作用。《新青年》以后的种种思想、哲学、文学、伦理、道德、教育、美术的讨论文字几乎都本着震醒青年，呼唤青年的目标。也正由于此，《新青年》几乎受到全国知识青年的一致赞誉与拥戴，风靡人心，照耀一代，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壮丽巍峨的第一块丰碑。

《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都是从思想革新、文学革新、教育革新三个大方向下手的。十九世纪末起西学东渐，从声光电化的科学技艺、坚船利炮的工业军事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西洋政体一一传入中国。从思想文化的历史积淀考察中学西学的同异优劣成为当时社会科学探索最重要的内容。陈独秀顺着冯桂芬、郑观应、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目光也注意到了中西民族性和思想文化差异的问题。他在1915年12月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以法制、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以感情、以虚文为本位。这里“战争”指竞争、开拓的意识（政治之战、商业之战），“安息”则指知足常乐、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敬告青年》一文中他也曾指出：“欧俗以横方无前为上

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原因，斯其一也。”这里他又强调“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有了个结论性的意见：“欧洲输入之文化，与我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这里陈独秀把“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的所谓“宪政实行”列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而阻碍这个“最后之觉悟”的便正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国粹意识形态——孔教。“五四”前夕从学术到政治，孔教已成为抵抗西方新思潮、新文化进入的主要堡垒，“打倒孔家店”的理论斗争刻不容缓了。陈独秀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宪法与孔教》）。为之陈独秀提出两条根本建议：输入西洋社会国家的学说，废止孔教的政治思想；推行民主平等、充满活力的教育精神，改造孔教僵化停滞，不切时用的教育政策。又把科学提到十分隆重的地位，而把孔教放回到一般宗教哲学的地位。他的《再论孔教问题》说：“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真应提倡尊重之也，当然在孔教、孔道及其他宗教哲学之上。”他在答“打倒孔家店”猛将吴虞的一封信中又明确指出，不攻破

孔教，“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答吴又陵》）。反孔教是这个时期陈独秀阐述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课题，《答俞颂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答佩剑青年》、《答傅桂馨》、《答常乃德》、《答刘竞天》、《复辟与尊孔》、《孔教研究》等文字都是围绕着这个课题而发议论的。这里陈独秀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对孔教作猛烈抨击，而对孔子学说本身尚持一个冷静的尊重态度，更不曾因批判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而根本否定道德、伦理本身。《答淮山逸民》一文言之甚明：“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应于今之世也。”又说：“愚固深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非唯有此认识，他还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标榜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正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所谓“笃行自好”，在污俗的社会中谋卓然自立，谋“救出自己”。其具体条目便是勤、俭、廉、洁、诚、信六字诀。当然他对此六字都已赋予了新的时代意识、新的社会内容了。

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文学革命上来。在紧接着的一期《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更为彻底的《文学革命论》，其最为精彩的一段云：“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

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章末尾又发出极富诱惑力的鼓动：“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雨果、左拉、歌德、卜特曼、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的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平心说，这一篇文章的力量确有“四十二生大炮”轰鸣之威。胡适与陈独秀两人文学革命舞台上的风云际会，才胆识力的聚合，又卷裹了一批猛将斗士，终于开了一个“新文化”的新天地、新气象，奠定了七十年来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基石。这期间陈独秀的一些重要文章如《答陈丹崖》、《答钱玄同》、《答曾毅》、《答胡适之》、《答沈藻墀》、《答张护兰》等都是讨论文学革命这个主题的，对新文学运动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陈独秀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他从小厌憎八股文，爱读《昭明文选》，对旧文学的虚文俗套、窒息性灵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在日本留学时曾专攻过西洋文学，他的老同学章士钊、苏曼殊的文章小说都要请他作序。他的旧体诗存世的约一百三十多首，风格气体大抵是学宋诗的，不仅感情丰满而且形式大胆，其中还有一首《哭亡兄》的，完全是白话。他也崇拜白话小说，曾说《红楼梦》、《水浒》比归有光的《姚姬传》的古文高明得多，他更大胆赞美《金瓶梅》，清健自然，“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这一点他比胡适、钱玄同的目光还深了一层）。他称赞马致远的剧本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他曾写过一篇《欧洲文艺谈》，精细地探讨了法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胡适曾说“把法国文学上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到中国来，陈先生算是最早的一个”。胡适一次在北京大学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归纳了陈氏对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一，把文学改良变成

了文学革命，立出三大主义；二，把新文学运动与政治伦理、道德的革命结合成一个大运动；三，他的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精神使文学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大成功。许多年后他们俩个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分道又相会时，胡适说，没有你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难达今日之成就；陈独秀说，没有你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还会停在八股的牢笼中。

陈独秀在“五四”前已十分注意中国的教育问题，并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改良方面的意见。1917年5月1日陈独秀在给安徽著名教育家胡晋接（号止澄）先生的信中说：“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为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答胡子承》）。两个月后他发表了在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稿《近代西洋教育》，把此信的提纲主要几条作了充实发挥，又强调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他认为这是一个严正的“道理的是非问题”，是具体教育方法的技术性改良的根本保证。1920年2月7日发表的《新教育的精神》中陈独秀归纳出三条：一，教育必须趋重社会，紧密联系社会；二，教育结合实际，努力学以致用；三，以启发性教育为主，能力培养为上。提倡这三条新精神又必须要反对两个主要障碍，即他在《教育缺点》一文中指出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他十分赞同杜威的教育理论，敬佩杜威的教育思想。他对以上两种主义的攻击正是来自杜威的指导。他

强调杜威来中国最精彩的演讲便在教育学，“可惜我国人对于他所讲的最精要的教育，不十分注意。”陈独秀不但在教育改革上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都是信仰杜威的，《新青年宣言》中他宣称“尊重实验哲学”，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中他赞赏杜威的民治主义，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范畴都提倡以西洋人为榜样，从民治主义的政治到自由主义的学术都“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他甚至还说过，“我们中国若免不了将亡国的命运，宁肯亡在欧美列强手里，也不要亡在日本手里。”他四次去日本留学，却持这种观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

陈独秀在以英美为榜样，积极鼓吹社会改革的理论宣传中又强调个人先知先觉的作用而对广大的民众则始终抱着轻视蔑视的态度。在东西方哲人中他在精神情绪上崇拜尼采，但在理智意识上却更乐意接受易卜生哲学。易卜生说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陈独秀说，这是“至理名言”。从先知先觉，思想启蒙这一点来说，他与易卜生灵犀相通，也与积极宣传易卜生主义的胡适灵犀相通，《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并非胡适一人的主意。陈独秀还到处劝人深读《国民公敌》、《社会栋梁》、《娜拉》。“五四”后期，陈独秀虽开始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思想的立足点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他常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自比，赞赏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的巨大思想贡献，肯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仍不能不说具有强烈的进步意义，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的大潮流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当然，陈独秀和《新青年》因

而也遭到全部旧势力的咒骂和攻击，在反动派的眼中犯了“滔天的大罪”。

陈独秀在《新青年 罪案之答辩书》中将《新青年》的“罪行”或者说功勋归结为两点：民主与科学。他说追本溯源，《新青年》只因为拥护了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滔天的大罪。”他明确表示为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何等的识见和胸襟啊！1916年6月陈独秀因亲自撰写和散发传单遭到官厅逮捕，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7.14）上著文道：“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欲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他逮捕和禁锢报给他”（《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由之可见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发生前夜的思想地位——他在那个时代的形象是一位屹立在反帝反封建最前沿阵地的大刀阔斧勇猛拚杀的斗士。毛泽东称他为“思

想界的明星”，李大钊称他为“光明的化身”，都不是一时的溢誉。

“五四”前后是陈独秀一生学术思想、文章形象最辉煌的时期。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1号上发表了《说政治》一文，标志着他的思想哲学与政治态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新青年》同人中的多数“向来主张绝口不说政治”的错误，明确表示了谈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浓烈兴趣，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的面貌出现于《新青年》和以后的《向导》周刊上。《对于时局之我见》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国家、社会、阶级、政党、权力、法律诸上层建筑的政治实质。1921年5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是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章，陈独秀在此文章中集中谈了他对马克思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他宣称，从前一切的社会主义，“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贫富弄得绝对平均或相对的平均”，他认为这种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绝对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蓝图。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来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他预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的危机，等待着它的必然是崩溃的命运，代之而起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分配原则，庶能克服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病。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一本刊物的创刊宣言，而且是一篇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的政治革命宣言，他号召中国的劳动者：“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

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期间（1920—1924）他陆续写出了《劳工神圣与罢工》、《告劳工》、《革命与制度》、《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答蔡和森》、《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的教训》、《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马克思学说》、《答黄凌霜》、《告做劳工运动的人》等文章，满怀激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有的文章如《为自由而战》、《怎么打倒军阀》、《统一的国民运动》、《青年们应当怎样做》、《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等几乎就是直接鼓动斗争的檄文。这时的陈独秀已经走在了实际阶级斗争的前列，思想学术上也沉浸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尤其是唯物史观中。

不过这个时期陈独秀的激进的革命文字中也时而露出思想深层的意识，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形态仍是法兰西、美利坚式的民主制度。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更多的情况下他是一个坐在书斋里大做其共产主义文章的愤激的书生，还没有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

在教育观念上，这一时期的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仍与“五四”时期一样，资产阶级“新教育”的观念甚而更深了一层。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他细心地论述了新旧两种教育观念的深刻差异，进一步肯定了资产阶级“新教育”的方向，并为这个“新教育”画了一幅理想的、完美的蓝图，这个“新教育”的蓝图的底色仍是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他在教育科学上对杜威思想的传播是不遗余力的。——陈独秀的教育观虽然自始至终停留在资产阶级“新教育”和杜威的教育思想中，但在当时无论对教育科学这门学科来说还是对旧中国的教育改革的

实践来说还是具有明显的进步、积极意义的。

在文化领域里，这一时期陈独秀对所谓国学、国粹、东方文明进行了更为猛烈地抨击。他指责那些热衷于提倡东方文化精神生活的旧势力为“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精神生活、东方文化》），他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所谓“国粹”和“东方文化”才是中国人解放思想，阔步前进的一条“康庄大道”。

尽管这样，陈独秀对文学尤其是他曾发誓要推倒的“古典文学”（正是一种“国粹”）却没有多少深恶痛绝的表示，他在《做旧诗》一文中娓娓而谈旧诗（不少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山林文学”）的种种妙处、种种难处，讨论青年人该不该、能不能做旧诗的问题时，心平气和，津津有滋味，不时露出过来人深沉、高远、老到的神态。尤其是在胡适考证小说、整理国故的同时，他也赶时髦写了《儒林外史 新叙》、《红楼梦 新叙》、《西游记 新叙》三个“新叙”，用以批评、研究、讨论这三部古典小说的新观点、新理论、新哲学。这与他热切地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文艺观风马牛不相及。从这几个方面的局限来看，陈独秀一直在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觉悟了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动摇徘徊，不仅没有转化上升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由于内因的主要作用，不由自主地后退了！

1924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迫在眉睫，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与目光放到了大革命的实践上，这个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政治时事评论，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国民革命。重要文章有《列宁与中国》、《十月革命与东方》、《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等，又以“实庵”（或“实”）的名义写了不少随感录，如《帝国主义者不可无走狗》、《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等。这期间他有很大一部分文章是以党的总书记或政策发言人的名义撰写的，如《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我们目前的奋斗》、《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这一时期陈独秀在实际政治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的职务，以后陈独秀坚持错误立场，鼓吹取消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咒为“军事投机”，攻击六大路线，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宗派活动，终于1929年11月15日被清除出党。开除出党后的陈独秀公开亮出托洛茨基的旗帜，组织托派小集团。他先纠集了一批人成立“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撰写张扬托派观点的文章，继而又与其他三个托派小组织联合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自任“书记”，成为统一的中国托派的首领。这期间他在《无产者》、《火花》、《热潮》等托派刊物上撰写了一批反党文章。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经多方营救，乃免军法处决，移江宁地方法院看管候审。1933年4月26日由江苏高等法院派员赴南京审结，以“文字为判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独秀于8月27日获释。他在南京狱中五年撰写了一些文字音韵和考证类著作，如《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实庵字说及其他》、《老子考略》等，个别篇章曾在公开刊物发表，大部分没有公开披露，故尔在学术界影响甚小。这期间他还以化名为一些托派小刊物，如《嚶鸣》、《动向》等撰写过一些小文章，影响更微。

陈独秀出狱后，虽然不再公开参加政治党派活动，但以个人身份对政治尤其是抗战前途发表过许多文字，也做过多次演讲，社会活动一度甚为频繁。陈独秀后期主要文章有《孔子与中国》、《抗日战争之意义》、《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我的根本意见》、《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这些文章反映了陈独秀后期的根本立场和政治态度。他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一厢情愿地要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吹捧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事业百般嘲讽与诋毁。他对抗战前途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发展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政治命运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明显错误的观点。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声称他的政治信仰、社会哲学观点仍是这样一个公式：“民主、科学 社会主义”“民主、科学 共产主义”。毫无疑问，陈独秀生命后期的学术主旨从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退了下来，自我否定了他自己曾执著追求的政治宗旨和奋斗目标。

为了对陈独秀有完整的认识，我们也选收了一些他的后期代表文章，借以观照其思想形态演变之迹以及晚年的观念意识和哲学立场，为我们今天历史地全面地评价陈独秀一生功过提供重要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一生走过的道路，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着十分紧密而错综的联系，也客观地映照出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段行迹。但愿这一册选集为我们科学地总结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经验、合理地阐明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积储一份富有认识价值的新鲜材料，把我国社会科学的探索进程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胡明

1987年11月北京

安徽爱国会演说

我等今日方开演说会，议阻俄约事，适湖北学生转寄来北京师范、仕学二馆学生与各省学堂公函，言之沉痛，恐诸公阅鉴难周，兹特照原函讲读一通。

读毕复泣告诸君曰：

俄约七条，各报遍载，诸君谅已见之，其约之横暴无礼处请略言之。

该约第一条即东三省官制中国政府不得擅改。以本国政府改本国官制，与俄何与！其阻之者有二意：一夺中国设官之权，一阻中国革新内政故耳。

第二条为不准将东三省开辟口岸与各国通商。通商不通商，应为中国主权内自由之举动，他国何得干涉！俄之为此者，欲独占东三省，恐他国之稍分其利益也。

第三条为东三省矿产须独归俄人开采。一国财源，矿业居其大半，俄取东三省矿业，不啻全取东三省矣。

第四条为铁路归俄兵保护。东三省铁道沿途已为俄兵保护，今复以此为言者，欲于铁道之地皆归俄兵占领耳。

第五条为东三省练兵必须延请俄人。兵权占政权之大端，俄人此计，欲夺兵权，且使中国人出饷，其狡如何！

第六条牛庄关税当归俄人管理。各省税司延用外人已为失计，然尚由私聘，非由其政府逼迫者：今俄人挟其国力以取此，是俄人直自取牛庄关税耳！

第七条为俄于各省城设商务局。商务所包者广，一设商务局，三省地方各事皆归彼族辖治矣。

诚如是约，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而且要我以设官练兵，是犹之田已卖而还要纳税也。

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夫俄人虐待我中国人已非一日。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数。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

不但俄如是也，凡亡国之民，如印度、波兰无不如此。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其惨状亦何堪设想！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其性质相异如是，其现象亦各自不同。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者，皆云中国无爱国心，只

知贪生畏死，虽如何辱之，彼亦不敢反抗，即瓜分之，中国人决不敢多言。呜呼！我国人果真如此耶？抑彼族妄言耶？思之当一大痛哭。

我等今日当力戒此弊，辟平日跑反之狂言，当尽死守土地之责任；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改平日骂官之浅见，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现在俄约事急，我等当就力所能及，筹一切实办法。诸君必各有高见。

据仆之意，有三要件：

第一消息。如此次俄之密约，已在前月，本月初上海始知之，沿江沿海今始遍传，再入内地，不知何日始可得此消息！若欧、美、日本，前月已喧传于各报。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

第二思想。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

第三体魄。我全国之人皆奄奄无生气，若长此不振，即以农、工、商、矿等实业，亦必战败于生计界，而不可以长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我等虽人少力薄，但能依此三要件，筹出切实办法，于国事终不无影响。

呜呼！此事关系全国存亡，全国人尚淡视之，殊令人寒心。即以皖垣而论，赴此会集议者不过二百余人。计此等漠视国事之徒，约分四种：

第一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

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波兰卖国贵族私通敌兵，攻击义师，前车可鉴也。

第二种，只保身家，不问国事，以国家之兴衰治乱，皆政府之责，人民何必干预。不知国事不支，岂政府独受其累！各人身家又焉能保？全国中无深谋远虑之绅商皆此类也。

第三种为似开通而不开通之士流。以空言无益，贵行实事，此论极是。但其并不能实行，较之空言尚可发人思想，犹居其下流也。

第四种草野愚民，不知俄约之迫，并不知瓜分之说，其爱国思想更何由发达？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

凡我国中人士，十有八九不出此四种，国安得不亡！种安得不灭！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此即今日开会本意。

诸君如有高见，望剖爱国热肠于大众之前。如再迟疑，稿阅时日，求如今日之集议演说，恐亦梦想不得矣！噫嘻，痛哉！乞诸君快赐教。

原载 1903 年 5 月 26 日《苏报》

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

唉！人生在世，糊里糊涂的过去，一项学问也不懂得，一样事体也不知道，岂不可耻吗？就是有钱的，天天躺在家里，陪着娇妻美妾，吃的珍香百味，好不快活。但是不通时事，若遇有兵荒扰乱的时候，那里可以避乱，那里可以谋生，那里是荒年多盗，那里是太平无事，这都要打听的一些真实的消息，才好保得身家性命哩。若说起穷人来，越发要懂得点学问，通达些时事，出外去见人谋事，包管人家也看得起些。却是因为想学点学问，通些时事，个个人都是要上学攻书？这岂不是一桩难事么？但是有一样巧妙的法子就是买几种报来家看看，也可以学点学问，通些时事，这就算事半功倍了。但是现在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的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这样说起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所以各省做好事的人，可怜他们同乡不能够多多识字读书的，难以学点学问，通些时事，就做出俗话报，给他们的同乡、亲戚、朋友看看。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种，上海有《中国白话报》，绍兴有《绍兴白话报》，宁波有《宁波白话报》，潮州有《潮州白话报》，苏州有《苏州白话报》，

我都看见过。我就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皖南、皖北老山里头，离上海又远，各种报都看着不着，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象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国的兵，都已经占了北京城，我们安徽省徽州、颖州的人，还在传说义和团大得胜战。那时候若是有了这种俗话报看，也可以得点实在的信息，何至于说这样梦话呢？我因为这个缘故，就约了几位顶相好的朋友，大家拿出钱来，在我们安徽省，来开办这种俗话报。我这种俗话报的主义，是很浅近的，很和平的，大家别要疑心我有什么奇怪吓人的议论。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我这两种主义，想大家都是喜欢的，大家只管放心来买看看。不是我自己夸口的话，这报的好处，一是门类分得多，各项人看着都有益处。二是做报的都是安徽人，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懂得。三是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还有多少好处，一时也说不尽。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而且本省、外省、本国、外国的事体，没有一样不知道，这真算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

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以多认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就是有钱的人，一件事都不想做，躺在鸦片烟灯上，拿一本这俗话报，看看里边的小说、戏曲和别样笑话儿，也着实可以消遣。做小生意的人，为了衣食儿女，白天里东奔西走，忙了一天，晚上间空的时候，买一本这俗话报看看，倒也开心，比到那庙里听书，烟馆里吃烟，要好得多了。我说的这些好处，大家如若不相信，再请看看后头的章程，便可知道详细了。

《安徽俗话报》的章程

一，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并不是说些无味的白话，大家别要当作怪物，也别要当作儿戏，才不负做报人的苦心。

一，报里面的文章共分十三门：

第一门论说。是就着眼面前的事体和道理，讲给大家听听。

第二门要紧的新闻。无论是本国的、外国的，凡是有了要紧的信息，都要照实登出。

第三门本省的新闻。凡是安徽地方的治乱工艺的盛衰、年成的好歹、学堂的光景以及各种奇怪的案情，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告诉大家。

第四门历史。是把从古到今的国政民情，圣贤豪杰，细细说来给大家做个榜样，比那《三国演义》、《说唐》、《说宋》还要有趣。

第五门地理。凡是本省的、外省的、本国的、外国的山川城镇、风俗物产，都要样样写出，但不是什么看坟山、谋风水

的地理，大家别要认错了。

第六门教育。这门又分为二类，一是读书的法子，好教穷寒人家妇女孩子们，不要花钱从先生，也能够读书识字，通点文法，一是教书的法子，好教做先生的用些巧妙的法子，不至误人子弟。

第七门实业。无论农、工、商、贾，凡有新鲜巧妙的法子，学会了就可发财的，都要明明白白告诉大家。

第八门小说。无非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些哩。

第九门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着琵琶弦子唱唱，到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

第十门闲谈。无论古时的、现在的、本国的、外国的，凡是奇怪的事，好笑的事，随便写出几条，大家闲来无事看看，到也开心哩。

第十一门行情。我们徽班的生意，在长江一带要算顶大了。现在我要将本省、外省、本国、外国各种的行情，打听清楚，告诉大家。全望主徽班的，格外大发其财，我才欢喜哩。

第十二门要件。凡是各种的紧要章程、条约、奏摺、告示、书信、游记，都要用俗话写出。

第十三门来文。若是列位看报的做了俗话的文章送来，本报也可以选些好的登出。

一，这报每月出两本，到了初一、十五就可出报，风雨无阻。

一，每本二十页，若是列位看报的，说我俗话做得好，日

后再加几页，或每月多出一本也可以的。

一，每本定价，零卖每本大钱五十文，全年二十四本——大钱一千文，半年五百文。本省邮费在内，外省全年另加邮费洋二角。

一，如有人愿作代派处的，至十份以外，概提二成酬劳，但要先付报费，然后寄报。

一，本报的本钱，全靠各处同乡捐助，如有关心乡谊的官绅，捐钱帮助本报，凡捐数过洋五元的，敬送本报一年，并将捐助诸公姓氏写在报后，作为收据。

一，各项绅商的告白，都可以代登，收价格外便宜，临时而议。

一，时势逼迫，急于出报，所以章程门类都订得不很完全，以后还望各位同乡常常指教。

原载 1904 年 3 月 31 日《安徽俗话报》第 1 期

敬告青年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勸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

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第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

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 [Nietzche] 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 [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 [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 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暂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

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世界进化，駸駸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穆勒(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德

(Comte) 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一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铿 (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槩生活 (英文曰 Life, 德文曰 Leben, 法文曰 La vie) 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

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原载 1915 年 9 月 15 日《新青年》1 卷 1 号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文明云者，异于蒙昧未开化者之称也。La Civilisation，汉译为文明、开化、教化，诸义。世界各国，无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惟地阻时更，其质量遂至相越。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人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 -

afayette, 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刊布中外, 欧罗巴之人心, 若梦之觉, 若醉之醒, 晓然于人权之可贵, 群起而抗其君主, 仆其贵族, 列国宪章, 赖以成立。薛纽伯有言曰:“古之法律, 贵族的法律也。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阶级, 使各人固守其分位。然近时之社会, 民主的社会也。人人于法律之前, 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 所存者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而已, 公平等固已成立矣。”(语见薛氏所著《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之“结论”, 第四一五页。)由斯以谈, 人类之得以为人, 不至永沦奴籍者, 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

宗教之功, 胜残劝善, 未尝无益于人群; 然其迷信神权, 蔽塞人智, 是所短也。欧人笃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華, 不容有所短长, 一若中国之隆重纲常名教也。自英之达尔文, 持生物进化之说, 谓人类非由神造, 其后递相推演, 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 昭垂于人类, 人类争吁智灵, 以人胜天, 以学理构成原则, 自造其祸福, 自导其知行, 神圣不易之宗风, 任命听天之惰性, 吐弃无遗, 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 于焉大进。世多称生物学为十九世纪文明之特征, 然追本溯源, 达尔文生物进化之说, 实本诸法兰西人拉马克(Lamarck)。拉氏之《动物哲学》, 出版于千八百有九年, 以科学论究物种之进化, 与人类之由来, 实空前大著也。其说谓生物最古之祖先, 为最下级之单纯有机体; 此单纯有机体, 乃由无机物自然发生, 以顺应与遗传, 为生物进化之二大作用。其后五十年, 倾动世界之达尔文进化论, 盖继拉氏而起者也。法兰西人之有大功于人类也又若此!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 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 破坏无余, 所

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巴贝夫 (Babe- uf) 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 (La communaute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门 (Saint- Simon) 及傅立叶 (Fonrie- 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 (Lassalle) 及马克思 (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

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创造此文明之恩人方与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相战，其胜负尚未可逆睹。夫德意志之科学，虽为吾人所尊崇，仍属近代文明之产物；表示其特别之文明有功人类者，吾人未之知也；所可知者，其反对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已。文明若德意志，其人之理想，决非东洋诸国可比。其文豪大哲，社会党人，岂无一爱平等、自由、博爱，为世矜式

者？特其多数人之心理，爱自由爱平等之心，为爱强国强种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英俄之攻德意志，其用心非吾所知；若法兰西人，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也。即战而败，其创造文明之大恩，吾人亦不可因之忘却。昔法败于德，德之大哲尼采曰：“吾德人勿胜而骄，彼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实视汝因袭之文明而战胜也。”吾人当三复斯言。

原载 1915 年 9 月 15 日《新青年》1 卷 1 号

今日之教育方针

居今日之中国而谈教育，无贤不肖将共非之。上方百计仆此以为弭乱之计，下亦以非生事所需，一言教育，贤者叹为空谈，不肖者置为多事，吾则以为皆非也。多事之说，良以教育非能致富求官也，然则教育之所以急需，正为此辈而设。空谈之说，亦志行薄弱，随俗进退者之用心，吾无取也。何以言之？盖教育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之所授受；自广义言之，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以执政之摧残学校，遂谓无教育之可言，执政倘焚书坑儒，将更谓识字之迂阔乎？以如斯志行薄弱之人主持教育，虽学校遍乎域中，岁费增至亿万，兴国作民之事，必无望也！反乎此者，虽执政尽废全国学校，而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发空谈之长叹，煽消极之恶风，其罪殆与摧残教育之执政相等。即以狭义之教育言之，二三年以来，学校破坏，诚可痛心；然就此子遗，非绝无振作精神之余地；乃必欲委心任运，因循敷衍，致此残败之余，亦归残败，青年学子，用以自放，绝无进取向上之心，呜呼！是谁之罪欤？吾以为已破坏之学校，罪在执政；未破坏之学校，其

腐败堕落等于破坏者，则罪在教育家！

教育家之整理教育，其术至广，而大别为三：一曰教育之对象，一曰教育之方针，一曰教育之方法。教育之对象者，即受教育者之生理的及心理的性质也；教育之方针者，应采何主义以为归宿也；教育之方法者，应若何教授陶冶以实施此方针也。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舵。不此是图，其他设施，悉无意识。

第所谓教育方针者，中外古今，举无一致。欧洲中世，教育之权，操之僧侣，其所持教育方针，乃以养成近似神子（即耶稣）之人物；近世政教分离，国民普通教育，恒属于国家之经营，施教方针，于焉大异。斯巴达（Sparta，古代希腊Laconia州之首府）人之教育，期以好勇善斗，此所谓军国民教育主义也。此主义已为近世教育家所不取（德意志及日本虽以军国主义闻于天下，然其国之隆盛，盖不独在兵强，其国民教育方针，德智力三者未尝偏废），以其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失设教之正鹄也。法兰西哲学家卢梭，以人生本乎自然，为立教之则，此哲学家之偏见，未可施诸国民普通教育者也。德意志之哲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近世教育家之泰斗也。其说以品行之陶冶，为教育之极则，十九世纪言教育者，多以赫氏为宗。所谓赫尔巴特派教育学与康德派哲学，殆如并世之双峰；然晚近学者多非之，至称为雕刻师而非教育家，盖以其徒事表象之庄严，陷于漠视体育与心灵二大缺点也。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而各国特有之教育精神：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军国主义，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钱万能主义之国也。稽此列强教育之成功，均有以矜式宇内

者。吾国今日之教育方针，将何所取法呼？

窃以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积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惟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准此以定今日教育之方针，教于斯，学于斯，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乎。依此方针，说其义于左方：

（一）现实主义

人生之真相，果如何乎？此哲学上之大问题也。欲解决此问题，似尚非今世人智之所能。征诸百家已成之说，神秘宗教，诉之理性，决其立言之不诚，定命之说，不得初因，难言后果。印度诸师悉以现象世界为妄觉，以梵天真如为本体（惟一切有部之说微异斯旨）；惟征之近世科学，官能妄觉，现象无常，其说不误。然觉官有妄，而物体自真；现象无常，而实质常住。森罗万象，瞬息变迁，此无常之象也。原子种性，相续不灭，此常之象也。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世界无尽，则众生无尽，众生无尽，则历史无尽。尔我一身，不过人间生命一部分之过程，勿见此身无常，遂谓世间一切无常；尔之种性及历史，乃与此现在实有之世界相永续也。以现象之变迁，疑真常之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假定梵天真如以为本体，薄现实而趣空观，厌倦偷安，人治退化，印度民族之衰微，古教宗风，不能无罪也。耶

稣之教，以为人造于神，复归于神，善者予以死后之生命，恶者夺之，以人生为神之事业。其说虽诞，然谓天国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故信奉其教之民，受祸尚不若印度之烈。加之近世科学大兴，人治与宗教并立，群知古说迷信，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

总之，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近世科学家之解释人生也；个人之于世界，犹细胞之于人身，新陈代谢，死生相续，理无可逃；惟物质遗之子孙（原子不灭），精神传之历史（种性不灭）；个体之生命无连续，全体之生命无断灭；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厌生，复不畏死；知吾身现实之生存，为人类永久生命可贵之一隙，非常非暂，益非幻非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古之所谓理想的道德的黄金时代，已无价值之可言。德意志诗人海涅（Heine，生于一七九七年，卒于一八五六年）有言曰：“海之帝国属于英吉利，陆之帝国属于法兰西，空之帝国属于德意志。”斯言也，意在讽劝其国人，一变其理想主义为现实主义也。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

（二）惟民主义

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

相连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此种散沙之国民，投诸国际生存竞争之漩涡，国家之衰亡，不待蓍卜。是以世界优越之民族，由家族团体，进而为地方团体，更进而为国家团体。近世欧洲文明进于中古者，国家主义，亦一特异之征也。第国家主义既盛，渐趋过当，遂不免侵害人民之权利。是以英法革命以还，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欧洲各国，俄罗斯土耳其之外，未有敢蹂躏宪章，反抗民意者也。十八世纪以来之欧洲绝异于前者，惟民主义之赐也。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良以国家之罪恶，已发见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终毁。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

惟国人欲采用此主义，必先了解此主义之内容。内容维何？欧美政治学者诠释近世国家之通义曰：“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易词言之，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人民应有自觉自重之精神，毋徒事责难于政府。若期期唯共和国体是争，犹非根本之计也。

(三) 职业主义

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古今社会状态之变迁，与经济状态之变迁，同一步度。此社会学者经济学者所同认也。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一人失其生产力，则社会失其一部分之安宁幸福。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

征之吾国经济现象，果如何乎？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者也。债权无效，游惰无惩；此法律之害于经济者也。官吏苛求，上下无信；姬妾仆从，漫无限制，此政治之害于经济者也。并此数因，全国之人，习为游惰，君子以闲散鸣高，遗累于戚友；小人以骗盗糊口，为害于闾阎。生寡食众，用急为舒。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

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

(四) 兽性主义

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

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动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所不同者，吾人独有自动的发展力耳。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

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彼之文明教育，粲然大备，而烛远之士，恒期期以丧失此性为忧，良有以也。

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翼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穹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穹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吾人倘不以劣败自甘，司教育者与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慎毋河汉吾言，以常见虚文自蔽也！

原载 1915 年 10 月 15 日《新青年》1 卷 2 号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请言其大者:

(一)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黜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斯说也,吾无以易之。

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

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难之骨气,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诗》曰:“君之宗

之。”《礼》曰：“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纲，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西洋民族之重视法治，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

或谓西俗夫妇非以爱情结合艳称于世者乎？是非深知西洋民族社会之真相者也。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反目，直讼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

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 ;既为法治家庭 ,则亲子昆季夫妇 ,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 ,权利义务之间 ,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亲不责子以权利 ,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 ,风行欧洲。夫妇生活之外无有余贻者 ,咸以生子为莫大之厄运。不徒中下社会如斯也 ,英国贵妇人乃以爱犬不爱小儿见称于世 ,良以重视个人自身之利益 ,而绝无血统家族之观念 ;故夫妇问题与产子问题 ,不啻风马牛相去万里也。若夫东洋民族 ,夫妇问题 ,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旧律无子 ,得以出妻。重家族 ,轻个人 ,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 ,初亦缘此而起。亲之养子 ,子之养亲 ,为毕生之义务。不孝不慈 ,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

西俗成家之子 ,恒离亲而别居 ,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My family)者 ,必其独立生活也 ;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My father family) ,用语严别 ,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 ,亲养其子 ,复育其孙 ;以五递进 ,又各纳妇 ,一门之内 ,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 ,传为佳话。虚文炫世 ,其害滋多 ;男妇群居 ,内多诟谇 ;依赖成性 ,生产日微 ;貌为家庭和乐 ,实则黑幕潜张 ,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 ,率为共产 ,倘不相养 ,必为世讥。事畜之外 ,兼及昆季。至简之家 ,恒有八口。一人之力 ,易以肩兹 ?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 ,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复不少。交游称贷 ,视为当然 ,其偿也无期 ,其质也无物 ,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门 ,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轻去其乡里 ,视戚友若盗贼。社会经济 ,因以大乱。

凡此种种恶风 ,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浅见者自表面论之 ,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 ,为风俗淳厚之征 ;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 ,内恒愤忌。以君子始 ,以小人终 ,受之者习为贪惰 ,自

促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 ,何厚之有 ? 以法治实利为重者 ,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 ;然其结果 ,社会各人 ,不相互依赖 ,人自为战 ,以独立之生计 ,成独立之人格 ,各守分际 ,不相侵渔。以小人始 ,以君子终 ,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以此为俗 ,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

原载 1915 年 12 月 15 日《新青年》1 卷 4 号

新 青 年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且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浅化之民，势所必至。倘有精确之统计，示以年表，其必惊心怵目也无疑。

世界各国青年死亡之病因，德国以结核性为最多，然据一九一二年之统计，较三十年前减少半数。英国以呼吸器病为最多，据今统计，较之十余年前，减少四分之一。日本青年之死亡，以脑神经系之疾为最多，而最近调查，较十年前，减少六分之一。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十年来，青年死亡率之锐减，列国无与比伦。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

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良有以也。

而我之青年则何如乎？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

更进而一论心理上之新青年何以别于旧青年乎？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贱种”，即曰“卑劣无耻”。将忍此而终古乎？誓将一雪此耻乎？此责任不得不加诸未尝堕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诸君之双肩。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之青年，均无论矣。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

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数十寒暑耳，乐天者荡，厌世者偷，惟知于此可贵之

数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者得之。准此以行,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岁不我与,时不再来,计功之期,屈指可诿。一切未来之责任,毕生之光荣,又皆于此数十寒暑中之青年时代十数寒暑间植其大本。前瞻古人,后念来者,此身将为何如人,自不应仅以做官求荣为归宿也。

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英人边沁氏,幸福论者之泰斗也。举人生乐事凡十余,而财富之乐居其一;举人生之痛苦亦十余事,而处分财富之难,即列诸拙劣痛苦之内。审是,金钱虽有万能之现象,而幸福与财富,绝不可视为一物也明矣。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主义者,是不知幸福之为何物也。

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信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

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

此灭种将由此削。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齷齪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因其精神上之齷齪下流，与彼腐败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

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销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原载 1916 年 9 月 1 日《新青年》2 卷 1 号

宪法与孔教

“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然既有纷争矣，则必演为吾国极重大之问题。其故何哉？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

余尝谓“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见《吾人最后之觉悟》）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及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吾国人既已纷纷讨论，予亦不得不附以赘言。

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轨。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吾人可大胆宣言者也。今让一步言之，即云浅化之民，宗教在所不废。然通行吾国各宗教，若佛教教律之精严，

教理之高深，岂不可贵？又若基督教尊奉一神，宗教意识之明瞭，信徒制行之清洁，往往远胜于推尊孔教之士大夫。今蔑视他宗，独尊一孔，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者，任人信仰何教，自由选择，皆得享受国家同等之待遇，而无所歧视。今有议员王谢家建议，以为倘废祀孔，乃侵害人民信教之自由，其言实不可解。国家未尝祀佛，未尝祀耶，今亦不祀孔，平等待遇，正所谓尊重信教自由，何云侵害？盖王君目无佛、耶，只知有孔，未尝梦见信教自由之为何物也。）

今再让一步言之。或云佛、耶二教，非吾人固有之精神，孔教乃中华之国粹。然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

今再让一步言之，或谓儒教包举百家，独尊其说，乃足以化民善俗。夫非人是己，宗风所同。使孔教会仅以私人团体，立教于社会，国家固应予以与各教同等之自由。使仅以“孔学会”号召于国中，尤吾人所赞许。（西人于前代大哲，率有学会以祀之。）今乃专横跋扈，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国家，独尊祀孔氏，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呜呼！以国家之力强迫信教，欧洲宗教战争，殷鉴不远。即谓吾民酷爱和平，不至激成战斗，而实际生活，必发生种种撞扰不宁之现象。（例如假令定孔教为国教，则总统选举法，及官吏任用法，必增加异教徒不获当选一条。否则异教徒之为总统官吏者，不祀孔则违法，祀孔则叛教，无一不是。又如学校生徒之信奉佛、道、耶、回各教者，不祀孔则违背校规，祀孔则毁坏其信仰，亦无一不是。）去化民善俗之效也远矣。

以何者为教育大本，万国宪法，无此武断专横之规定。而孔子之道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与否，犹属第二问题。盖宪法者，全

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 ,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以今世学术思想之发达 ,无论集硕学若干辈 ,设会讨论教育大本 ,究应以何人学说为宗 ,吾知其未敢轻决而著书宣告于众。况挟堂堂国宪 ,强全国之从同 ,以阻思想信仰之自由 ,其无理取闹 ,宁非奇谈 !

凡兹理由 ,俱至明浅 ,稍有识者皆知之 ,此时贤之尊孔者 ,所以不以孔教为宗教者有之 ;以为宗教而不主张假宪法以强人信从者有之。此派之尊孔者 ,虽无强人同己之恶习 ,其根本见解 ,予亦不敢盲从。故今所讨论者 ,非孔教是否宗教问题 ,且非但孔教可否定入宪法问题 ,乃孔教是否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也。此根本问题 ,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 ,至深且广 ,不得不急图解决者也。欲解决此问题 ,宜单刀直入 ,肉搏问题之中心。

其中心谓何 ,即民国教育精神果为何物 ,孔子之道又果为何物 ,二者是否可以相容是也。

西洋所谓法治国者 ,其最大精神 ,乃为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绝无尊卑贵贱之殊。虽君主国亦以此为立宪之正轨 ,民主共和 ,益无论矣。然则共和国民之教育 ,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 ,毫无疑义。复次欲知孔子之道 ,果为何物。此主张尊孔与废孔者 ,皆应有明瞭之概念 ,非可笼统其词以为褒贬也。

今之尊孔者 ,率分甲乙二派 :甲派以三纲五常为名教之大防 ,中外古今 ,莫可逾越 ,西洋物质文明 ,固可尊贵 ,独至孔门礼教 ,固彼所未逮。此中国特有之文明 ,不可妄议废弃者也。乙派则以为三纲五常之说 ,出于纬书 ,宋儒盛倡之 ,遂酿成君权万能之未弊 ,原始孔教 ,不如是也。持此说之最有条理者 ,莫如顾实君 ,谓宋以后之孔教 ,为君权化之伪孔教 ;原始孔教 ,为民间化之

真孔教。三纲五常，属于伪孔教范畴，取司马迁之说，以四教（文、行、忠、信），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慎（齐、战、疾）为原始之真孔教范畴。（以上皆顾实君之说，详见第二号《民彝》杂志《社会教育及共和国魂之孔教论》。）愚则宁是甲而非乙也。

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教忠（忠有二义：一对于一切人，一对于君。与孝并言者，必为对君之忠可知。）教孝（吴稚晖先生，谓孝为古人用爱最挚之一名词，非如南宋以后人之脑子，合忠孝为一谈，一若言孝，而有家庭服从之组织，隐隐寓之于中；又云孝之名即不存，以博爱代之：父与父言博爱，慈矣；子与子言博爱，孝矣（以上见十月九日《中华新报》《说孝》）。倘认人类秉有相爱性，何独无情于骨肉？吴先生以爱代孝之说尚矣。惟儒教之言孝，与墨教之言爱，有亲疏等差之不同，此儒、墨之鸿沟，孟氏所以斥墨为无父也。吴先生之言，必为墨家所欢迎，而为孔孟所不许。父母死三年，尚无改其道，何论生存时家庭服从之组织？儒教莫要于礼，礼莫重于祭，祭则推本于孝。《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又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儒以孝为人类治化之大原，何只与忠并列？《祭统》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云：“孝莫大于严父。”又云：“父母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又云：“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审是，忠孝并为一谈，非始于南宋，乃孔门立教之大则也。吴先生所云，毋乃犹避腐儒非古侮圣之讥也欤？教从，《郊特牲》曰：“妇人，从者也，幼则父兄，嫁则从夫，夫死从子。”）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三纲之实质也耶？“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搯之流血，起敬起孝”；“妇人者，伏于人也”；“夫不在，敛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此岂宋以后人尊君尊父尊男尊夫之语耶？纬书，古史也，可以翼经，岂宋后之著作？董仲舒、马融、班固，皆两汉大儒。董造《春秋繁露》，马注《论语》，班辑《白虎通》，皆采用三纲之说。朱子不过沿用旧义，岂可独罪宋儒？

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何以言之？儒教之精华曰礼。礼者何？《坊记》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哀公问》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运》曰：“礼者，君之大柄也。”《礼器》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冠义》曰：“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是皆礼之精义。（晏婴所讥盛容繁饰，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此犹属仪文之末。）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也。（三纲之义，乃起于礼别尊卑，始于夫妇，终于君臣，共贯同条，不可偏废者也。今人欲偏废君臣，根本已摧，其余二纲，焉能存在？浏阳李女士，主张夫妻平等，以为无伤于君父二纲。（见本年第五号《妇女杂志》社说）是皆不明三纲一贯之根本精神之出于礼教也。）

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

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之人权说以相较，必无人能议孔教之非。即今或谓吾华贱族，与哲人殊化，未可强效西颦，愚亦心以为非而口不能辨。惟明明以共和国民自居，以输入西洋文明自励者，亦于与共和政体、西洋文明绝对相反之别尊卑、明贵贱之孔教，不欲吐弃，此愚之所大惑也。以议员而尊孔子之道，则其所处之地位，殊欠斟酌；盖律以庶人不议，则代议政

体,民选议院,岂孔教之所许?(《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乃指唐虞之世,君主私相禅授而言。略类袁氏“金匱石室”制度。与今世人民之有选举权,绝不同也。)以宪法而有尊孔条文,则其余条文,无不可废;盖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之?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英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原载 1916 年 11 月 1 日《新青年》2 卷 3 号

再论孔教问题

吾国人学术思想不进步之重大原因，乃在持论笼统，与辨理之不明。近来孔教问题之纷囁不决，亦职此故。余故于发论之先，敢为读者珍重申明之。

第一，余之信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其理由颇繁，姑略言之。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一曰人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学属之；人为法者，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也，宗教道德法律皆属之。无食则饥，衰老则死，此全部生物永久必然之事，决非一部分一时期当然遵循者。若夫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早婚有罚，此等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或谓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解，决疑释忧，厥惟宗教。余则以为科学之进步，前途尚远。吾人未可以今日之科学自画，谓为终难决疑。反之，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不

达”而已！

复次,则论孔教。夫“孔教”二字,殊不成一名词。中国旧说中,惟阴阳家言,属于宗教。墨家明鬼,亦尚近之。儒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孔子,儒者也。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为中心。其为教也,文行忠信,不论生死,不语鬼神。其称儒行于鲁君也,皆立身行己之事,无一言近于今世之所谓宗教者。孔教名词,起源于南北朝三教之争。其实道家之老子与儒家之孔子,均非教主。其立说之实质,绝无宗教家言也。夫孔教之名词,既不能成立,强欲定孔教为国教者,詎非妄人。相传有二近视者,因争辨匾额字画之是非,至于互斗,明眼人自旁窃笑,盖并匾额而无之也。今之主张孔教者,亦无异于是！

假令从社会之习惯,承认孔教或儒教为一名词,亦不可牵入政治,垂之宪章。盖政教分途,已成公例,宪法乃系法律性质,全国从同,万不能涉及宗教道德,使人得有出入依违之余地。此蔡子民先生所以谓“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国家是国家,义理各别,勿能强作一谈”也。蔡先生不反对孔子,更不绝对反对宗教,此余之所不同也。其论孔子、宗教、国家,三者性质绝异,界限分明,不能强合,此余之所同也。孔教而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孔子之道,可为修身之大本,定入宪法,则先于孔子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后于孔子之杨、墨、孟、荀、程、朱、陆、王之道,何一不可为修身之大本?乌可一言而决者?其纷争又岂让于教祸?

或谓国教诚不可有,孔子亦非宗教家,惟孔门修身之道,为吾国德教之源,数千年人心所系,一旦摈弃,重为风俗人心之患,

故应定入宪法以为教育之大方针。余对此说,有三疑问,以求解答:

(1)孔门修身伦理学说,是否可与共和立宪政体相容?儒家礼教是否可以施行于今世国民之日常生活?

(2)宪法是否可以涉及教育问题及道德问题?

(3)万国宪法条文中,有无人之姓名发现?

倘不能解答此三种疑问,则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为万国所无之大笑话!国会议员中,竟有多数人作此毫无知识之主张者,无惑乎解散国会之声盈天下也!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其应提倡尊重之也,当然在孔教、孔道及其他宗教哲学之上。然提倡之,尊重之,可也,规定于宪法,使人提倡之,尊重之,则大不可。宪法纯然属于法律范围,不能涉及教育问题,犹之不能涉及实业问题,非以教育实业为不重也;不能以法律规定尊重孔子之道,犹之不能以法律规定尊重何种科学,非以孔道、科学为不重也。至于孔子之道,不能为共和国民修身之大本,尚属别一问题。宪法中不能规定以何人之道为修身大本,固不择孔子与卢梭也。岂独反对民权共和之孔道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之大本,即提倡民权共和之学派,亦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之大本。盖法律与宗教教育,义各有畔,不可相乱也。

今之反对国教者,无不持约法中信教自由之条文以为戈矛。都中近且有人发起“信教自由会”,以鼓吹舆论。余固以为合理,而于事实则犹有未尽者。何以言之?中国文庙遍于郡县,春秋二祀,官厅学校,奉行日久,盖俨然国教也。而信仰他教者,政府亦

未尝加以迫害或禁止。即令以孔教为国教 ,定入宪法 ,余料各科并行 ,仍未必有所阻害。故余以为各教信徒 ,对于政府所应力争者 ,非人民信教自由之权利 ,乃国家待遇各教平等之权利也。国家收入 ,乃全国人民公共之担负 ,非孔教徒独立之担负。以国费立庙祀孔 ,亦当以国费建寺院祀佛道 ,建教堂祀耶、回 ;否则一律不立庙 ,不致祭 ,国家待遇各教 ,方无畸重畸轻之罪戾。各教教徒对于国家担负平等 ,所享权利亦应平等 ,必如是而后教祸始不酝酿于国中。由斯以谈 ,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 ,定入未来之宪法 ,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

原载 1917 年 1 月 1 日《新青年》2 卷 5 号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左右：

奉手书并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东亚、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书局成立后，编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余详孟邹书中，俗冗不及详叙。手颂道祉

弟 独秀白

《新青年》欲求足下月赐一文，作或译均可。又及。

原载 1979 年 5 月中华书局《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文学革命论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嚷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

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钞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垛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诋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

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苦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穹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

藻饰依他，失独立自主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穹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斯德之法兰西，予尤爱雨果、左拉之法兰西；予爱康德、黑格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歌德、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培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更斯、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雨果、左拉、歌德、卜特曼、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原载 1917年 2月 1日《新青年》2卷 6号。

答淮山逸民(道德)

淮山逸民先生：

尊论旧道德不适今世，愚所赞同。惟将道德本身根本否认之，愚所不敢苟同者也。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然谓今之社会，无需道德，道德乃野蛮半开化时之名词，而非文明大进时代之所有物，诚愚所不解。野蛮半开化时代，有野蛮半开化时代之道德（如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是）；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无论人类进化至何程度，但有二人以上之交际，当然发生道德问题。

愚固深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

指斥旧道德之最趋极端者，莫如德国之尼采，然彼固悍然承认残忍嗜杀、自利自尊为道德。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是非乃另一问题。然彼亦未尝否认道德本身名词之存在，固彰彰明也。

日本人挑拨吾族之恶感，理或有之。然其取吾人代表远东民族，亦未尝无理由。吾人亦乐得承认之。足下以为如何？

独秀 一九一七，三，一。

原载 1917年3月1日《新青年》3卷1号

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适之先生足下：

惠书敬悉。鄙意区分中国文学之时代，不独已承钱玄同先生之教，以全宋属之近代，且觉中国文学，一变于魏，再变于唐（诗中之杜，文中之韩，均为变古开今之大枢纽），故拟区分上古迄建安为古代期，建安迄唐为中古期，唐宋迄今为近代期。玄同先生颇然此说，不知足下以为如何？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主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餘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率复不宣。

独秀 一九一七，五，一。

原载 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答胡子承（思想革新）

子承先生左右：

辱赐书，过蒙奖励，且矜且惭。先生讲学万山中，不识世俗荣利为何物，所遇门下诸贤，大都洁行而朴学，知先生之德教感人也深矣，溥矣。以硕德名宿如先生者，道破旧式思想之污浊，提倡教育精神之革新，新教育真教育之得见于神州大陆也，当为日不远矣。

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先生倘以为不谬，尚希时赐教言，且指斥所不备，幸莫大焉！

独秀谨复 一九一七，五，一。

原载 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近代西洋教育

——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

今日之中国，各种事业败坏已极，承贵校诸君招来演说，鄙人心中想说的话极多，但是从何处说起呢？诸君毕业后，或当教习，或别入他校求学，大约不离教育界。现在就着教育事业，略说一二。

吾人提起“教育”二字，往往心中发生二种疑问：第一是吾人何以必须教育？第二是教育何以必须取法西洋？

第一种疑问，就是西洋也有一派学者，主张人之善恶智愚，乃天性生成，教育无效的。但是此种偏见，多数学者均不承认，以为人之善恶智愚，生来本性的力量诚然不小，后来教育的力量又何尝全然无效？譬如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经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未受教育的人，好象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象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愚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了。

第二种疑问，乃是中国人普通见解，以为西洋各国不过此时国富兵强，至于文物制度，学问思想，未必事事都比中国优胜。简单说起来，就是不信服西洋文明驾乎中国之上，所以不信服中国教育必须取法欧美。方才贵校校长张先生说：“此时西洋各国学术思想潮流，居世界之大部分，吾国不过居一小部分，只合一小部分随从大部分，不能够强教大部分随从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中国必须舍旧维新。”鄙人觉得张校长这话犹是对那没有知识比较中西文明优劣的人说法。其实吾国文明若果在西洋之上，西洋各国部分虽大，吾人亦不肯盲从，舍长取短。正因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就是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西洋各国居世界之最小一部分，这大部分的人也应当取法这一小部分。所以鄙人之意，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秋桐先生方才说道：“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单就经济能力而言，我们中国人此时万万赶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无法可以救亡。”鄙人以为秋桐先生此言，可谓探本之论。

吾人的教育，既然必须取法西洋，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是什么，然后所办的教育才真是教育，不是科举，才真是西洋教育，不是中国教育。不然，象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做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分别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大兴教育，同时我又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要明白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

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我们教育若想取法西洋，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有几种大方针：

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

我国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古人的著书，先生的教训，都是神圣不可非议。照此依样葫芦，便是成功的妙诀。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至于西洋近代教育，则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不象那被动主义、灌输主义的教育，不顾学生的心理状态，只管拚命教去，教出来的人物，好象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此时意大利国蒙得梭利 Maria Montessori 女士的教授法，轰动了全世界。他的教授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张极端的自动启发主义，用种种游戏法，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教师立于旁观地位，除恶劣害人的事以外，无不一任儿童完全的自动自由。此种教授法，现在已经通行欧美各国，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还是守着从前被动的灌输的老法子，教师盲教，学生盲从。启发儿童的游戏图画等功课，毫不注意。拚命的读那和学生毫无关系的历史（小学生决不懂得自与历史有什么关系），毫无用处的外国文，以为这就是取法西洋的新教育了。哈哈！实在是坑死人也！

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

孔特分人类进化为三时代：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欧美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的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

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近来一元哲学，自然文学，日渐发达，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所以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此时学校教育以外，又盛兴童子军 Boy Scout 的教育，一切煮饭、烧菜、洗衣、缝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不象东方人连吃饭、穿衣、走路的知识本领也没有，专门天天想做大学者、大书箱、大圣贤、大仙、大佛。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谭嗣同有言曰：“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教他们眼里如何能看得起我

们可厌的中国人呢？

中国教育，不合西洋近代教育的地方甚多。以上三样，乃是最重要的。请君毕业后，或教育他人，或是自己教育自己，请在这三样上十分注意。

原载 1917 年 7 月 1 日《新青年》3 卷 5 号

答陶孟和（世界语）

孟和先生足下：

来书论世界语，思精义繁，迷信世界语过当者所应有之忠告也。惟鄙意尚有不致苟同于足下者，希略陈之。

来书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来书谓“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此鄙人微有不以为然者也。

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共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譬之吾中国，闽粤燕赵之人，相聚各操土语，其不便不快孰甚？普通官话（即国语）之需要，自不待言。今之世界人类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世界语，不能强人皆用英国语或中国语，犹之吾国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官话，不能强人皆用北京话或广东话也。足下倘不以此见为大谬，则于世界语三种怀疑，似可冰释。

世界万事，皆进化的也。世界语亦然。各国语何莫不然？虽不完全，岂足为病？极言之，柴门霍夫之世界语即不适用而归

淘汰，亦必有他种世界语发生。良以世界语之根本作用，为将来人类必需之要求，不可废也。各国各别之语言，依各国各别之民族心理历史而存在，斯诚不诬；然所谓民族心理，所谓国民性，岂终古不可消灭之物乎？想足下亦不能无疑。

足下谓世界语为无民族之语言，仆则谓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且国界未泯，民族观念存在期间，各国语与世界语不妨并存，犹之吾国不能因此时未便强废各省方言，遂谓无提倡普通官话之必要也。足下倘无疑于全中国之国语，当亦无疑于全世界之世界语。

语言如器械，以利交通耳，重在一致之统一，非若学说兴废有是非、真谬之可言。来书以孔子专制罢黜百家喻之，似不恰当。况提倡世界语者，未尝欲即废各国语耶？今之世界语中，东洋各国语无位置，此诚吾人私心之所痛憾；欲弥此憾，是在吾人之自奋。吾人之文明，吾人之艺术，果于世界史上有存在之价值，吾人正可假世界语之邮，输出远方，永远存在（此意已于三卷四号《新青年》答钱玄同先生书中略言之）。否则于人何尤？闭门造车，出门每不合辙。虽严拒世界语而谓人不我重，究于吾文明存在之价值有何补耶？

世界人类历史无尽，则人类语言之孳乳亦无尽。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在理自不应以欧语为限。此义也，迷信世界语者当知之。务为世界之世界语，勿为欧洲之世界语尔。

仆犹有一言欲质诸足下者：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语言其一端耳。高明以为如何？率复不具。

独秀 一九一七，八，一。
原载 1917年8月1日《新青年》3卷6号。

人 生 真 义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得回答的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自古以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约有数种：第一是宗教家，象那佛教家说：世界本来是个幻象，人生本来无生；“真如”本性为“无明”所迷，才现出一切生灭幻象；一旦“无明”灭，一切生灭幻象都没有了，还有甚么世界，还有甚么人生呢？又象那耶稣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学家，象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又象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又象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又象那杨朱主张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对他人讲甚么道德。又象那德国人尼采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第三是科学家。科学家说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甚么

灵魂；生存的时候，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死后物质分散，另变一种作用，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

这些人所说的道理，各个不同。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呢？我想佛教家所说的话，未免大迂阔。个人的生灭，虽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体，能说不是真实存在吗？人生“真如”性中，何以忽然有“无明”呢？既然有了“无明”，众生的“无明”，何以忽然都能灭尽呢？“无明”既然不灭，一切生灭现象，何以能免呢？一切生灭现象既不能免，吾人人生在世，便要想想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才是。耶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种行为和事业，不能包括人生全体的真义。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杨朱和尼采的主张，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去，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的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科学家说人死没有灵魂，生时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这几句话到难以驳他。但是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连续的记忆和知觉吗？

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时代的人所见人生真义，可以明

白了。今略举如下：

(一) 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一) 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一) 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

(一) 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

(一) 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一) 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原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

(一) 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呢？

(一) 个人之在社会，好象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

(一) 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可以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譬如有主义的战争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类或民族的污点。极大的瘟疫，往往促成科学的发达。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原载 1918 年 2 月 15 日《新青年》4 卷 2 号

有鬼论质疑

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曲征杂引，以为鬼之存在，确无疑义，于是著书立说，鬼话联篇，不独己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即好学尊疑之士，亦以远西性觉 Intuition（日本人译为直觉，或云直观，或云观照。吾以为即释家之所谓“自心现量”，乃想越感官之知觉也，与感觉 Sensibility 为对文）哲学方盛，物质感觉以外，岂必无真理可寻？遂于不能以科学解释之鬼神问题，未敢轻断其有无。今予亦采纳尊疑主义，于主张无鬼之先，对于有鬼之说多所怀疑，颇期主张有鬼论者赐以解答。

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倘云鬼之为物，玄妙非为物质所包，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何以鬼之形使人见，鬼之声使人闻？此不可解者一也。敢问。

鬼果形质俱备，惟非普通人眼所能见；则今人之于鬼，犹古人之于微生物，虽非人人所能见，而其物质的存在与活动，可以科学解释之，当然无疑。审是则物、灵二元说，尚有立足之余地乎？此不可解者二也。敢问。

鬼若有质，何以不占空间之位置，而自生障碍，且为他质

之障碍？此不可解者三也。敢问。

或云鬼之为物有形而无质耶？夫宇宙间有形无质者，只有二物：一为幻象，一为影象。幻为非有，影则其自身亦为非有。鬼既无质，何以知其为实有耶？此不可解者四也。敢问。

鬼既非有质，何以言鬼者，每称其有衣食男女之事，一如物质的人间耶？此不可解者五也。敢问。

鬼果是灵，与物为二，何以各仍保其物质生存时之声音笑貌乎？此不可解者六也。敢问。

若谓鬼属灵界，与物界殊途，不可以物界之观念推测鬼之有无，而何以今之言鬼者，见其国籍、语言、习俗、衣冠之各别，悉若人间耶？此不可解者七也。敢问。

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而何以今之言鬼者，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此不可解者八也。敢问。

原载 1918 年 5 月 15 日《新青年》4 卷 5 号

学 术 独 立

中国学术下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家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也，而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原载 1918 年 7 月 15 日《新青年》5 卷 1 号

偶像破坏论

“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

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世界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班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

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古代草昧初开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他才能居然统一国土。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事到如今,这等不但骗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们看穿,还不应该破坏么?

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若说到国家自卫主义,乃不成问题。自卫主义,因侵害主义发生。若无侵害,自卫何为?侵害是因,自卫是果。)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国际竞争。现在欧洲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但是世界上多数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明白这种偶像的害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因为功业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相当的纪

念在人人心目中。节孝必出于自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方有价值；若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虚荣心伪道德的坏处，较之不道德尤甚。这种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却是真功业真道德的大障碍！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原载 1918 年 8 月 15 日《新青年》5 卷 2 号

《每周评论》发刊词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

原载 1918 年 12 月 22 日《每周评论》第 1 号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象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

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叶、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辨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原载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

除 三 害

我刚写出这题目,有一位朋友见着,说:你是做戏评吗?我说:不是评那戏台上的旧戏,是评这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戏。朋友说:你莫非要骂徐树铮、张作霖、倪嗣冲么?我说:不是,不是。你别忙,听我细细评论这中国的三害:

第一是军人害。世界上的军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中国的军人算是更坏。威吓长官,欺压平民,包贩烟土,包贩私盐,只要洋枪在手,便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无恶不作。那为首的好汉,还要藉着这班“官土匪”的势力,来逼迫总统,解散国会,抢夺军械,把持政权,破坏法律。直弄得全国人民除军人外都没有饭吃。这不是中国的大害吗?

第二是官僚害。我所说的官僚,并不是政治学上所谓“官僚政治”的官僚。官僚政治,是中央地方所有的行政都归官办,自然不及人民自治的政制完善,却非那官僚本身的罪恶。我所说的官僚,乃是中国式的官僚。一生的志愿,长在谋官做,刮地皮,逢迎权贵,欺压平民。国法是什么,官规是什么,地方的利弊是什么,人民的苦乐是什么,一概不问;一心只想发点财,回家享福。其中厚脸的角色,还要自夸有经验,重道德。拼命的勾结门生故旧,把持政权。拼命的抑制那新思想,新人物,不许他丝毫发展。不问

是前清的旧官僚,或是民国的新官僚,不问是目不识丁的蠢物,或是学贯中外的名流,但凡官僚犯了以上所说的毛病,我就认定他为害中国不在军人之下。

第三是政客害。政客先生们口里也说军人和官僚不好。我们当初也只望他们比军人、官僚稍胜一筹。照他们现在的行为看起来,实在令人不敢佩服。其中固然不能说没有好人。但是大多数的政客,有的是依附军人的新官僚,有的是混入政客的旧官僚,有的是改扮政客的军人。满口的政治、法律,表面上虽然比军人、官僚文明的多,但是用X光线一照,他们那抢钱抢位置的心眼儿,都和军人、官僚是一样。跑到北方就说要保全中央的威信,跑到南方就说要护法。到了和他位置有关系的时候,什么中央威信,什么护法,都可以牺牲的。这几年,政治的紊乱,就说不是他们兴风作浪,却未见那一党、那一派的政客,堂堂正正的发表政见,诉诸舆论,来贯彻他的主张,都是鬼鬼祟祟的单独行动,东去运动督军,西去联络名流,忙着开什么和平会,把疏通一切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当作将来自己做总理,做总长,做次长,做省长,做道尹,做县知事,当厘金差事的手段。把这班政客烧成了灰,用五千倍的显微镜,也寻不出一粒为国为民的分子来。

并不是我好张口骂人。我们问问良心,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

苦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原载 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号

旧 党 的 罪 恶

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原。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原载 1919年 3月 2日《每周评论》第 11号

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原载 1919 年 6 月 8 日《每周评论》第 25 号

北京市民宣言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原稿写于 1919 年 6 月 9 日，录自 1982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影印原件。

《新青年》宣言

本志具体的主张 ,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 ,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 ,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 ,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 ,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 ,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 ,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 ,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 ,已经造了无穷罪恶 ,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 ,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 ,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 ,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 ,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 ,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 ,树立新时代的精神 ,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 ,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 ,渐渐减少 ,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

识有信仰的反对 ,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 ,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 ,出于决断的态度 ;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 ;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原载 1919年 12月 1日《新青年》7卷 1号

法律与言论自由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象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创造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象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不和他一样,他便要办他儿子忤逆不孝的罪;认真严办起来,岂不要断绝后代!

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论他,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象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

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原载 1919年 12月 1日《新青年》7卷 1号

调和论与旧道德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同一人数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用时代划分,同一民族中,各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也不能用时代划分,这等有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性较深的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我们抱着改良社会志愿的人,固然可以据进化史上不幸的事实,叙述他悲悯他实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灾乐祸得意扬扬的主张他应该如此。譬

如人类本能上,有侵略、独占、利己、忌妒、争杀、虚伪、欺诈等等恶德,也没有人能不承认是实在如此。然断乎没有人肯主张应该如此。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

再说到道德问题。这是人类进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却不限于西洋、东洋。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因为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象知识那样容易进步。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发达,乃是因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是人类普通的现象,各民族都是一样,却不限于东洋、西洋。

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

的部分,所以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不懂得旧道德的功效在那里。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

旧的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什么,好处在那里,勤俭二字用在道德的行为上,自然是新旧道德都有的,不算旧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为上,象那刻薄成家的守财奴,勤俭都是他作恶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标准呢?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章行严先生说:“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这种偏枯专制,没有人己平等的思想,也正是旧道德造成的。这种道德就是达到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会,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共同生活的理想,还远的很,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不能满足。

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 ,女人奢侈卖淫 ,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 ,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 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 ,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 ,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 ,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们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 ,道德上应当复旧 ,岂不是“抱薪救火 ,扬汤止沸 !”

原载 1919年 12月 1日《新青年》7卷 1号

留 学 生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派遣留学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国,一次是现代派到西洋。这两次的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简直可以说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这两次留学生造成的。我们中国派遣学生出洋的时间、人数都不算很少,东洋留学生和中国文化史未必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卖国史却是关系很深了。西洋留学生除马眉叔、严几道、王亮畴、章行严、胡适之几个人以外,和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班留学生对于近来的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成绩,恐怕还要在国内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的底下(至于那反对新文化的老少留学生,自然又当别论)。这是什么缘故?各部里每月用几百张纸钱,可怜裹住了多少英雄!我奉劝已回国未回国的留学生诸君,别抛弃你自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

原载 1919 年 12 月 1 日《新青年》7 卷 1 号

实行民治的基础

“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组织”

民治是什么？难道就是北京《民治日报》所说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 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 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 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的民治主义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

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实行民治，自然也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而且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政治虽是最重要的工具，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说若要改良政治，别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别拿工具当目的，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们目的的工具。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在这两种工具当中，又是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的。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至于他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觉得还有点不彻底；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

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民治，自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政治的民治主义”这七个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还不大顺眼。但是我决不因此灰心短气，因为有三个缘故：一是中国创造共和的岁月，比起欧美来还是太浅，陈年老病那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国社会史上的现象，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这种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的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象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三是中国人工商业不进化和国家观念不发达，从坏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因此物质文明不进步，因此国民没有一致团结力；从好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却因此没有造成象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井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我们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的格言；因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

现在政象不佳，没有实行民治主义的缘故，也有好几层：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们从前把建设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军全由军人主动，一般国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都以为政府万能，把全副精神用在宪法问题、国会问题、内阁问题、省制问题、全国的水利交通问题，至于民治的基础——人民的自治与联合——反无人来过问。五是少数提倡地方自治的人，虽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旧迷信大规模的省自治和县自治，其实这种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划分行政区域和地方长官权限的问题，仍旧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截然是两件事。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必须把上面说的二、三、四、五这几层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实事，少出风头，把大伟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运动家、大爱国者的架子收将起来，低下头在那小规模的不威风的坚实的民治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上做工夫。不然，无论北洋军人执政也罢，西南军人执政也罢，交通系得势也罢，北方的安福部得势也罢，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学会）得势也罢，进步党的内阁也罢，国民党的内阁也罢，旧官僚的内阁也罢，我可以断定中国的民治，仍旧是北京《民治日报》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民治。

我不是说不要宪法，不要国会，不要好内阁，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国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对省自治、县自治。我以为这些事业，必须建筑在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充分发展；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筑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

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象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坏；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

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那一国都还没有实行；政治的民治主义，英美两国比较其余的国家，总算是发达的了。他们所以发达的由来，乃是经许多岁月，由许多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各种同业联合，合拢起来，才能够发挥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民治主义；好象一个生物体，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块整物，乃无数细胞组织、器官组织合拢起来，才能够成就全体的作用。他们的民治主义，不是由中央政府颁布一部宪法几条法令，就会马上涌现出来的，乃是他们全体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说道：“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找自由而来的，所以他们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

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的形式：就

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

现在有许多人的心理，以为时局如此纷乱，政府那里顾得到地方自治的问题；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还未经正式国会详细规定出来，我们怎样着手？至于同业联合的组织法，政府国会都还未曾想到，更是无从组织。我想这种见解是大错而特错，是有两个根本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以为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够实现。我以为这种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就是能够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我们不要，我们所要的，是从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第二个错误，是以为法律能够产生事实，事实不能够产生法律。我的见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对，我以为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社会上先有一种已成的事实，政府承认他的“当然”就是法律，学者说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学说。一切法律和学说，大概都从已成的事实产生出来的。譬如英、美两国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们的人民创造出来这种事实，后来才由政府编成法典，学者演成学说，并不是先由政府颁布法典，学者创出学说，他们人民才去照办的。所以我觉得时局纷乱不纷乱，政府提倡不提倡，国会有没有议决法案，都和我们人民组织地方自治、同业联合不生关系。

我所说的同业联合，和那由店东组织的各业公所及欧洲古时同业协会 (Guild) 不同，和欧洲此时由工人组织的职工联合 (旧译工联 Trade Union) 及其他各种劳动组合也不同。因为此时中国工商界，象那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工厂和各处铁路矿山的督办总办，都是阔老官，当然不能和职工们平起平坐。其余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纯粹资本作用和劳力没有发生显然的冲突以前，凡是亲身从事业

务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

关于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种种学说、制度，非常之多，至于详细的办法一时更说不尽。我现在单只就中国社会状态的需要而且可以实行的，举出几条原则，免得失了直接的实际的精神，就会发生笼统、涣散、空洞、利用、盘踞、腐败种种不可救药的老毛病。

最小范围的组织

乡间的地方自治，从一村一镇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一乡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马路或是警察的分区，分做许多小自治区域，先从这小区域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城自治市自治。同业联合是要拿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做范围，譬如一个码头的水手、船户、搬运夫，一个矿山的矿工，一条铁路的职工，一个城市的学校教职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木匠、瓦匠、车夫、轿夫、铁工、纺织工、漆工、裁缝、剃头匠、排印工人、邮差、脚夫等，各办各的同业联合；商业的店东管事和店员，在小城市里便归在一个联合，在大城市里，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业或马路分办各的同业联合；万万不可急于组织那笼统空洞的什么“工会”，广大无边的什么“上海商界联合会”，什么“全国工人联合会”。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

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

这种小组的地方团体和同业团体，人数都必然不多，团体内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会直接议决事务，无须采用代表制度。若是一个团体的事务，各个分子都有直接参与的权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以免得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在积极方面，可以养成多数人的组织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业上尽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观、团体涣散。中国现在的地方自治办不好，就是因为大家让少数的绅董盘踞在那里作恶，同业联合没有好效果，就是因为现在各业公所的组织，只是店东管事独霸的机关，与多数的职工店员无涉。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就是因为小组织的人少，便于全体直接参与，一扫从前绅董、店东、工头少数人把持的积弊，又可以磨练多数人办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数的教育程度不够，还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上的话来回答：“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对于政治有很大的责任，然后自然能养成一种政治人才。美国的浩雷斯曼说：‘我们的主张不是说人生下来就配干预政治，不过总要叫他配干预才是。’这就是民治主义的教育。从前美国的选举也有财产、教育、男女的限制，现在才把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没听人说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见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的，不是生来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

加入，我以为男女应该有同等权利的理论，姑且不提；单就事实上说，女子加入的坏处，我一时想不出；我却想出许多女子加入的好处，女子的和平、稳静、精细、有秩序、顾名誉、富于同情心等，可以使团体凝结的性质，都比男子好；他们第一美点，就是不利用团体去夤缘官做。

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

执行团体议决事务的董事，由团体全员投票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应当有教育、财产、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数宜多，任期宜短，不能连任，每半年改选三分之一，满期退任的次第抽签预定。无论大会或是董事会，都只设临时主席，取合议制，不设会长总董。这都是防备少数人盘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

地方自治应该注重的是：教育（小学校及阅书报社），选举（国会、省县议会及城乡自治会），道路，公共卫生；乡村的地方，加上积谷、水利、害虫三件事。同业联合应该注重的是：教育（补习夜学，阅书报社，通俗讲演），储蓄，公共卫生，相互救济（疾病、老、死、失业等事），消费公社，职业介绍，公共娱乐，劳工待遇等事。上海工业界现在有许多同业的联合会发生，我们十分欢迎，但是我们也有十分担心的两个疑问：（一）是否仅仅为了外交的感触？还是另有团体本身生活上实际需要的觉悟？（二）是否店东管事们在那里包办？上海各马路的商界

联合会，颇和我主张的小组织相同，但我们不能满意的地方：（一）到会的会员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体，并没有过半数。（二）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东管事，没有店员的分。（三）本身的组织和实际生活需要的问题，都没有谈起，请了许多事外的人来演说，发些救国裕商的空套议论，这是做什么！我盼望社会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为我所注重的实际需要讨价过低，说我主张不彻底；我相信照中国现社会的状况，只有这种小组织，注重这种实际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义坚持的基础，乃是政治经济彻底改造必经的门路。我盼望官场中神经过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马上就联想到破坏统一，不要提起同业联合，马上就联想到社会革命。我主张的这种小组织，实在平易可行，实在是共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实在说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什么社会革命。这种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们政权无涉，于你们官兴多碍，就是这种小组织的同业联合所注重的实际需要，也都是在现社会现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不但比不上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那样彻底，就是比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还要和平简陋得多。

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

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无论北洋军人、老官僚、新官僚、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己未系、政学系，可以总批他“明抢暗夺误国殃民”八个大字，一定要说那个好那个歹，都是一偏之见，缺少阅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

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础上最后要留意的，就是别让三害鬼混进来，伸出他背上的那只肮脏黑手，把我们的一线光明遮住了。蝇营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惯会看风头，乘机窃取起来，更是眼明腿快，我们要格外严防，别让他利用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办什么政党什么劳动党，做他当总长的敲门砖，最好是各种小组织的事务所，都贴上“小心扒手”，好叫大众留神。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坚实的基础，也是故意摆出矮户低檐的景象，好叫这班阔人恐怕碰坏了纱帽翅，不来光顾才好。

这篇文章刚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见张东荪先生新做的《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见《解放与改造》的一卷五号）说得很透彻，可以补我这篇文章的遗漏，读者务必要参看。我所主张的小组织好叫人人有直接参与权，似乎是打破一切寡头制度（头目包办制度自然包含在内）的根本方法；这种思想倘然能够成为事实，成为习惯，不但现在经济方面的恶制度可以扫除，就是将来较大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大组织，自然也不会有寡头专制的事发生，真民治主义才会实现。我所主张的同业联合，也含着有“两元的社会组织”的性质。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联合会日刊》所说的尽同，而且我不愿意采用“两元”的名词。因为本来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

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话说来太长，而且不是本篇的论旨，改日再谈罢。

原载 1919年 12月 1日《新青年》7卷 1号

新教育的精神

——在武昌高师的演讲词

教育怎么会有新旧的分呢？怎么样算是新教育呢？怎么样算是旧教育呢？我晓得，大家必定说：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这些科目要算是新教育，读经史、读四书、读古文、学美术，要算是旧教育，我说并不是这个样。无论什么教育，要研究他的时候，只要方法新，精神新，并不在科目的新，就是研究现在大家所公认的旧教育，只要他方法新，精神新，还是有用的。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精神不新，还是白说的。但我所说的新，要把他来分做三点：

- （一）教育要趋重社会；
- （二）要注重启发的教育；
- （三）要讲究实际应用。

（甲）教育怎么要趋重社会呢 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化就不堪问了。现在单说那研究经济学的，不晓得详察现在社会的状况和财政的盈虚，就是多读些中国经济

史、外国经济学又怎么样呢？那于社会是一点益处没有的。可见得教育要趋重社会不能趋重个人。

(乙)启发的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位。怎么说要以学生为本位呢？这个毛病不独中国有，连外国也是难免的。是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当教授的人，往往将自己所得的来发挥个人的意见，不问能不能供学生的研究和理会，只要将他所晓得的都说与学生，那就算是尽职了。要是这样一生没有用处，总是教员将所晓得的说与学生，学生晓得了又是这样的教与他将来的学生，这个文化思想力怎么会发展呢？所以我觉得教育是训练的，非口说的，是发展的，非流传的。道德的进步要有行为的教育，学问的进步要有知识的教育，象这样训练学生，就易于感觉了。

再说小学生的教育，更不能叫其读没有作用的书，做没得作用的事。只要就儿童心理所能领会的，审慎加以训练，使他好发展想象力，那就够了，并不在要他记得许多的典故和古人的姓名。我们要晓得儿童的想象力有限，他脑筋中既耗了许多的记忆力，他的想象力是必定不能发展的，学问怎会有进步呢？所以我主张小学生并不要教他的历史，教他一些好故事比教他的历史还要强些。这是什么讲究呢？就是因为儿童想象力薄弱，你要是教他一些那朝的古人兴败，他一定是不能了解的，到不如教他一些故事，他到觉得与现在的社会什么事相象与他的学问就有进步了。再说地理教育更不是这个教法，并不在一刻要晓得外国、中国的地名和要塞就算晓得地理，那是无用的。要教学生晓得现在住的地方有多大，出产有几多，再由城而及省，由省而及全国，由本国而及外国，那天下的地理就自然明瞭了。

(丙)实际的应用不在形式，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每研究形式好看，不讲究内里结不结实。我现在单说北京清华学校办的

图书馆，外面说他去了三十万块钱，那应该办得几好呢？其实不然，我过细一调查，他的图书大约去了两三万块钱，剩下的拿来做了什么事呢？都是拿来做了房子。你看那房子为什么要做得那样好呢？再说现在的教育部，依我说顶好是废除不用。你看在教育部办事的人几多晓得各地的情形和经济的状况？他只要就他们几个人所想的要各省的学校都来照他的整齐划一，所以各地的学校要兴的弄得不能兴，要废的弄得不能废，都是为他们限制了，要他有什么益处呢？到反为各地教育的障碍了。再说现在的农、商各学校更是好笑，你看有几多农业的学生下过田，几多商业的学生做过买卖，我说现在的农业学生还有赶不到老农夫的，商业的学生还有赶不到老朝奉的，这是什么缘故呢？都是讲究外表、不讲实际应用的病。我很希望后来办教育的人不要讲究形式，有几多钱办几大的学堂，科目不在多，只在其能不能适用，教员不在多，只在其有没有教授的方法和精神。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一定可以得到新教育，造就新人材矣！

原载 1920 年 2 月 9 日《国民新报》

教 育 缺 点

——在江苏省教育会上的演讲词

今天所讲的，统合说起来，是教育上的缺点，也可说就是教育上的罪恶。并且这种缺点和罪恶，并不是腐败的学校所有的现象，却是在平日声誉很好的学校，都免不了。真正腐败的学校，倒也赶不上这种缺点咧。我所说的教育上缺点和罪恶，一种是犯主观主义，一种是犯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是牵连一起。因为是主观的，所以有了形式的，因为有形式的，所以有主观的。这种弊病，在欧美各国亦不得免。在我国不但中等以上的学校，是这样，就是小学教育，也都是这样两种主义。先把主观主义的缺点说出来。教师只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时候，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意思灌输进去，这就是主观主义的现象。要知道好的教育，应该学生教先生，这句话说来很奇，怎样学生反而教起先生来呢？就是先生在教授时候，必定要拿学生做本位，细细考察这一班许多学生。因为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特性，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天才，用什么教材放进，便有什么反应发生，不是随便可以教授的，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经验来。做教育的，依据我国现

在教育，所以没有进步，坏在主观主义。这种主义，和以前教授经史百家的旧教育，有什么分别！不过拿经史百家的旧教材，改了史、地、理化等等新教材罢了。我们要知道新旧教育之不同，全在主观教育。和客观教育上分别，不是在教材上的关系，是在活用教材方法的关系。我们所以反对旧教育，并不是说西洋来的教育都是好，中国的旧教育都是坏。不过在主观、客观的分别，旧教育的弊病，不问学生是否明瞭，用他主观的眼光，随便灌输学生。什么伦理科、历史科、地理科，所授教材，全凭讲演，不切实用，就象伦理重在实践，不是说空话便算了事，在理应该把这科取消。历史科，排列了许多不相干的古事，崇拜偶像的说话，教给学生记忆，有什么用处？地理科，在乎简单明瞭，并不是罗列许多无用的地名，硬要学生牢记，这样教法 and 以前的旧教育的，教学生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什么分别呢？不说旁的，就是北京很有名的某学校，教职员的思想，也算很新的了，不过他们所授的教科，糊涂的很，陈列的文字，学生大都不懂。这也是中了主观主义的害处。欧美各国无论那种学校，每礼拜至多不过二十多个钟头，分了许多科目，好使学生欢喜那种就学习那种，倒是事半功倍，很有效验。总之，无论什么学校的功课，倘使和学生个性适应的尽管教他，不是这样，尽管定了许多课程，教了许多材料，但是于学生实际上丝毫没有影响。那是何苦呢！吾觉得现在国内学校，往往不肯细细考察个性，随便教育，就是大学也免不了这种弊病咧。

讲到形式主义的流弊和罪恶，不在主观主义之下。很多的学校，只重外面好看，装潢华丽，气象焕然，就是茅厕的门面，都有种种装饰，某地方还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样子，校门总是做起来很高，建筑必求新式，而于内容反一点不讲。实际上这样，教

育到底有什么益处？推原其故，因为教育部平时只在形式上考求。所以上行下效，弄得教育一点没有实际。最可笑的，称了工业学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不但使学生进了这种学校，如入五里雾中，一些没有领会，就是教的人自己也莫明其妙咧。我有一种感想，要使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教育部。你想他们住在京里，社会生活程度、人情风俗习惯，一点不懂，定了什么许多章程法令，硬要人家遵守。不依照他，他就要驳你不合部令，依照了他，事实上又是不能做到，这明明是叫人家进于虚伪的境界。照教育部的意思，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其实中国这样的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样可以统一呢！譬如做了一件衣服，说是不管那一个人的身体长短大小，都要照这件衣服的尺寸，那岂不是笑话吗？简直说一句话，教育部存在一天，中国的教育，一定办不好一天。还有考试一件事，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产物。这种弊病，很多很大。因为有了考试，就有什么毕业问题，文凭问题，引起了学生的虚荣心。教师学生平常多都不注意，临到考试时候，在这一二礼拜以内拼死用功，不但临场时夹带枪替，于道德上很有影响，并且废食忘眠，在身体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试完毕，把所有临时强记的完全忘掉了。有人说学生求学底目的，一种是要增加学问，一种是为社会进步、生活改良。象现在学生的求学，专为考试，这不过是为了毕业问题，希望早一天毕业，那文凭可早一天到手。所以种种罪恶，都从考试发生，道德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没有好处。

你看欧美的大学问家，尽有在学校里考试时候，屡次落第，到了后来，偏享盛名。日本教育大家某博士，在学生时代，每逢考试总是不利。后来他在大学学校里当了教员，很反对考试。其

实考试及格不足为荣，考试落第不足为辱。考试得利的不定是槩槩大才，考试失利的不全是庸劣无能。有人主张考试的，说一朝废去了考试，那学生的学业，不能够看出他进步不进步。这句话实在是差误的。照他说没有了考试，不能知道学业的进步，那末以前私塾先生惯用扑责，警诫学生，现在废掉了扑责，难道学生就不及从前吗？总之，学生的学业，并不因考试提进的。并且做了教师，平日里不能知道自己学生品行学业的好歹，偏要凭着考试方才知，这样漫不经心的教员，他平日的教育成绩也可想而知了。吾们要望学生道德上学业上进步，不在乎考试。另有好的方法，——譬如作文、英文等科，只要平常多方练习，自然能够进步。地理只要注重实地观察，化学注重在实验室里试验，那才可以得着好的效果。何必定要形式考试来贻误青年呢？所以我敢说，现在教育的流弊，不出这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自从杜威氏来吾国，到处演讲教育，他竭力攻击的就是这以上所说的两种主义。他说不但中国犯这种弊病，就是美国也未尝没有。日本更比中国不如，所以杜威到中国来最精要的讲演，却不在伦理学，也不在社会学，是在教育学。可惜我国人对于他所讲最精要的教育，不十分注意。现在我们教育界应该大家注意这点。因为这是教育上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所见教育上种种不好现象，归纳起来，不出这两个主义。

原载 1920 年 3 月 30 日、31 日、4 月 1 日《时报》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

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底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底《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底想象或愚人底妄想,想象、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尔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他,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底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

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底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

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通俗易懂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懂，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懂。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懂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欧美各国学校里、社会里、家庭里，充满了美术和音乐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会及个人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也不象我们中国人底生活这样干燥无味。有人反对妇女进庙烧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去烧香、去逛新世界，总比打麻雀好。吴稚晖先生说：“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我以为麻先生底势力比孔、关两位还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关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象信仰孔、关还多半是装饰门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们鬼混做一团。

他们如此信仰这位麻先生虽然是邪气，我也不反对，因为他们去打麻雀，还比吸鸦片烟好一点。鸦片烟、麻雀牌何以有这般力量叫我们堕落到现时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空言劝止人不要吸烟、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面理由；因为我们中国人社会及家庭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一样没有，若不去吸烟、打牌，资本家岂不要闲死，劳动者岂不要闷死？所以有人反对郑曼陀底时女画，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新年

里店家打十番锣鼓，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大舞台、天蟾舞台底皮簧戏曲，我以为也可以不必。表现人类最高心情底美术、音乐，到了郑曼陀底时女画、十番锣鼓、皮簧戏曲这步田地，我们固然应该为西洋人也要来倾向的东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并这几样也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连美术、音乐底种子都绝了，岂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子民先生曾说道：“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前几天我的朋友张申甫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说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谓之“精神” spirit）的，将来恐怕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最高的情感的（罗丹说：“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识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现在中国没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真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没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都没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都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识，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创造不可。”

关于各种新文化运动中底误解及缺点，上面已略略说过。另外还有应该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说中国人没有组织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没有组织力。忌妒独占的私欲心，人类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国人特别好些；但是因为他们有维持团体的公共心牵制，所以才有点组织能力，不象中国人这样涣散。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学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三五年不涣散的团体。最近学生运动里也发生了无数的内讧，和南北各派政

争遥遥相映。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半聋半瞎的八十衰翁，还要拼着老命做官发财，买田置地，简直是替儿孙做牛马，个人主义决不是这样。那卖国贪赃的民贼，也不尽为自己的享乐，有许多竟是省吃俭用的守财奴。所以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

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象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原载 1920 年 4 月 1 日《新青年》7 卷 5 号

陈独秀最近之演说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迫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运动。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者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

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小而结果大，不是一种好现象。在青年的精神上说起来，必定要牺牲大而结果小，才是好现象。此时学生牺牲的精神，若是不如去年，而希望的结果，却还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现象了。以上这两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诸君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之中，都不可依赖。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靠自己。

（原载 1920 年 4 月 22 日《时事新报》）

谈 政 治

(一)

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

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到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 (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 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 (详见 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 72 所引)。Christensen 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 (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 (见 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 45, 46, 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

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

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

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泡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

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相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丧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下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

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制裁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克思修正派，也就是 Be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

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 ilhelm Liebknecht 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W ilhelm Liebknecht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al Trading, P .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

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克思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 Bebel 死后德

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原载 1920 年 9 月 1 日《新青年》8 卷 1 号

《共产党》月刊短言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

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自己的信条。

原载 1920 年 11 月 7 日《共产党》第 1 号

主义与努力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譬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达到方向所在。

但现在有一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这话真是不错。

原载 1920 年 12 月 1 日《新青年》8 卷 4 号

提高与普及

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适之先生对于大学生主张程度提高，理论上自然是正当，别人驳他的话，我看都不十分中肯。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感想：

（一）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国多设大学，各大学中多收绝对不限资格的自由旁听生。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

（二）专就北京大学学生而论，现在低的还没有，如何去提高？我觉得眼前不必急于提高，乃急于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底基础学。历来北大底毕业生有几个能自由译读西文参考书的，有几个基础的普通科学学习得完备的？蔡子民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是何等危险！我劝适之先生别高谈什么提高不提高，赶快教朱谦之、易家钺一流学生多习点基础科学，多读点外国文，好进而研究有条理的哲学，好医医他们无条理的昏乱思想罢！

我这两种感想适之先生以为如何？

原载 1920 年 12 月 1 日《新青年》8 卷 4 号

社会主义批评

——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词

(一) 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种做改革进化底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他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理想来改造现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

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现代生产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现代生产方法有二大缺点不得不急图改造的：（一）是资本私有。现在大工业时代和从前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是简单生产工具可以生产的了；资本既然是私有，结果有资本的人才有工具做工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二）是生产过剩。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关于生产品底种类额量，不受国家之统计调节，资本家乘时投资，争加产额，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已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

现代分配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纺纱厂，资本一百万元，一年赚了净利一百万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钱八元，一年工价全额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总理以下各职员底薪水至多不过十万元，再就算上资本家底官利二分二十万元，共总

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底财产了。这个纺纱厂底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产品底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象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马上完全撤废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底私有财产。

总之：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二) 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

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关于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资本主义底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底危机，然后才达到结论。

资本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一切生产底工具，无工具不能生产，犹之无本不能生利，所以叫做资本；纸币是金钱底代表，金钱是资本底代表，都不是资本本身。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不一定劳动，利用自

己占有的资本雇用别人劳动而生产而得利益。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加他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底历史很早，远在渔猎时代，倘若那时雇人渔猎，或借器具给人渔猎而分得利益，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相同；到了农业时代，雇人耕种或买奴隶耕种，这时资本主义更是显然了；近来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虽与古代相同，而程度之差算是天渊之别了。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之最大原因有二：（一）由于交换方法之进步 古代物物交换，资本不易积聚，由资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万担谷或十万张牛皮，便不易于转移堆积了；后来发明了以金钱代表实物，小小的一块银可以代表几担谷几十张牛皮，交换方法进了步，资本主义也跟着进步；后来又发明了以纸币代表金钱，薄薄的一小张纸可以代表一千元一万元，交换方法更进一步，资本主义也跟着更进一步；到了银行制度发达起来，交换方法充分便利，无论多大数目的资本转移，只要银行记一笔帐出一张票子便得，这种便利的交换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担谷换多少张牛皮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近代资本底积聚和资本主义底发达，比起古代来也有天渊之别。（二）由于机器盛行 在手工业时代，有一把斧头一个墨斗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网便可以打鱼，有一架纺线车便可以纺纱，有一架织布机便可以织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印书，人人都很容易得着这简单的生产工具做一个独立生产者，所以在手工业时代，那雇人的资本阶级和被雇的劳动阶级是不大分明的；在这时代就是资本家自备工具雇人做工，那掠夺剩余价值来增加他们私有财产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机，每日织布一丈，价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

二角，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不过二角，一百架机用一百工人做工，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每日也不过二十元；若用蒸汽机，一百人做的工五个人就够了，资本家只付工价一元，其余九十五个人工价十九元都被资本家掠夺去了，这时一日的剩余价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这时工人与资本家所得乃一与三十九之比，推而至于五十人做工，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价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资本家一日掠夺的剩余价值乃有三万九千元之多。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忙替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聚起来的。机器积聚剩余价值既这样的迅速，交换方法又这样的便利，所以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迥非手工业时代所梦想得到的了。

一方面资本主义随着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的兴旺起来；一方面因为机器工业底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象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那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阶级底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

资本主义既这样强盛，压迫得劳动界无路可走，何以还说能讲社会主义呢？不然不然。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克思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

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资本阶级的也就是剩余价值。一定有人说：资本家占了剩余价值，资本无限增加，机器无限增多，生产品无限产出，岂不是很好的现象吗？岂不深合生众食寡为急用舒的孔门经济学说吗？殊不知在共产社会里生众食寡为急用舒或者是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可就不然了。在资本制度之下生产品增多，剩余价值也随着增多，此种无限增加的剩余价值复变为资本，不能用为社会公共增加福利，乃为少数的资本家所私有，于是乃由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过剩，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Crisis)，所以说生众食寡为急用舒在资本制度之下不一定是好现象。

上面的话或近于抽象了，再详细说一下：在理论上看起来，社会上最怕的是贫乏，生产品多多益善，生产过剩是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许许多多，本算是好现象；但这种生产过剩的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反变成了社会底危机，乃是因为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这就叫做供过于求，这便发生销路底困难，过剩的额越大，发生的困难也越大；例如社会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现在产出一千五百匹还不大紧要；若是产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产过剩额到了这步，社会上必然发生经济恐慌。因为资本制度之下的产业状况是极端自由的，是无政府的，无论何项产业资本家都可以自由联合自由投资增加生产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产品卖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资本家自由收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所得仅足糊口，生产较需要过剩了几倍，资本家虽然可以奢侈些，也断不能把同样的消费品陡然增加几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资本阶级底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千五百匹，劳动界因购买力不增加，不能多销，那生产过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发生滞销，跌价，停工，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

必然的现象。这种必然的现象总括说起来，乃是资本制度之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事发生；因为资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是承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底购买力便无从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则社会上消费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费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要发生经济恐慌。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溃的危机如马克思所指示，而马克思身后数十年资本阶级何以不但未曾崩溃并且日见强盛呢？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马克思学说失了效验。各国资本家拼命占据了剩余价值，拼命推广制造业，拼命寻求殖民地将所有的剩余生产送去销售了，才能够弥缝一时表面上没有十分现出危机来。所以近百年来，甲国与乙国战争，或者直接征服殖民地，消费了许多生命财产，结果所求得的不过是几条通商条约。因此资本主义便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解不解之缘，因为镇压殖民地或与他资本国争夺商场都非有强大的海陆军不可。名为自卫，或是爱国，或是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骗人的话，其实都不外销纳剩余的农产品，好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好维持资本阶级底权利；试看前几年欧洲大战，美其名曰民主与强权底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利用各国打倒德国，为保全他的世界海运权及亚非两洲底商权罢了，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扩张在中国朝鲜底商场，还美其名曰保存东亚和平是一样。

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除。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大言是怎样失败

的呢 正因为不懂得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底根本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败底道理。当日巴黎和会席上的英法当局，并不是良心特别比威尔逊坏些，乃因为他们的国家组织都立在资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国内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销纳，如何救济经济危机，如何维持他们资本阶级底地位呢？威尔逊总统不过说得好听点，如果他美国当真抛弃了军国主义，他美国在国外底殖民地和商场抛弃不抛弃？如果抛弃了，国内底剩余生产怎么样？所以威尔逊总统底主张不但在巴黎和会失败了，并且此时美国底海陆军备仍然是有加无已。日本鉴于美国底情势，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业底威权，也不能不竭力增税扩张海陆军备到现状一倍以上，日本当局非不知这税太重了全国底工人农民小学教员下级军官底困苦和不平是可恐的危机，但是他们更知道没有充分的武力保护商业不能输出剩余生产乃是更大的危机，所以明知道扩张军备是毒药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扩张军备是陷阱也不得不从上面走过去。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相互竞争扩张军备是无限的，相互争得的殖民地或商场是有限的；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军备无限的扩张是资本阶级杀人适以自杀的利器；我相信当初资本阶级是拿殖民政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了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我相信欧战底结果，国际资本阶级底基础已经大大的动摇，我更相信将来再经过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底末日，即国际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

崩溃的命运，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的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底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普；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到是各国资本制度底崩溃还未现实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这层事实上的困难，我们到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们确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努力打破这层困难底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

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

(三) 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既然有讲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他的派别分歧，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 一，无政府主义
- 二，共产主义
- 三，国家社会主义
- 四，工团主义
- 五，行会社会主义

上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马克思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张阶级战争，是出于马克思；二，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他的缺点正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的病；劳动者本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何待你不要，你尽管不要，资本阶级他是要的，他是要拿国家及政权来压制劳动的；工团主义者以为国家政治总会侵害工人底自由，试问呻吟于资本家政权之下的法国工团他们的自由在那里呢？

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

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战争底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底作用。行会社会主义者自以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他以为拿行会代表生产者底权利，以国家代表消费者底权利，这样公平的调和，可以免得剧烈的革命了。这种调和的理想是英国人的待性：其实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

所以我要注意的是前三派。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算有点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广东都有一小小部分青年相信。但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为几派，我以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底绝对自由。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没有个体自由底冲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够绝对的，而且艺术必须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一切束缚，天才方可以发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动，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价值。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

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此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

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那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的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先就经济而言：现代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而且个人或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但无政府主义者必定说：我们可以自由联合公议生产事业，断不至有这样过剩或不足的情形发生；那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没有一个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张各个的绝对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困难。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癡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癡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

的自由。不过发癲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癲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象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社会制度初变更的时候，应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肯劳动，要不要加以法律的干涉呢？监守公物而自盗，强力迫胁不悦己的妇女，这种人无论到何时代恐怕都有，应不应加以法律的制裁呢？所以我敢说，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五派中的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底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考茨基底正统派或是伯恩斯坦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孟什维克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克思，而两派的主张彼此却正相对如下表：

	阶级战争
	直接行动
共产主义底主张	无产阶级专政
	国际运动

劳资携手
议会政策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
民主政治
国家主义

第一，德国底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政党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克思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二，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克思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问俄国共产党：有产阶级的人也是国民，何以单单主张无产者一阶级专政？俄国人答道：你们何以不主张全国国民都加入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问道：一

阶级专政岂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国人答道：你们所谓民主政治底内容是不是有产者一阶级专政呢？考茨基著书大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说不合乎民主政治，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底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说：“（一）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二）颠覆有产阶级底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克思底主张，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四，俄国底共产党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虽然同一不反对国家组织，是他们不同之点有三：（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所以有人说马克思当初所主张的俄国现在所实行的都算是国家社会主义，这话是不对的。《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说：“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无产阶级在他们国里争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脱出一切国家的界限，替无产阶级全体指

示共通的利害。“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底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克思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彩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由以上四点看起来，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克思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克思，表面上却挂着马克思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的一件不可解的怪事。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国外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原载 1921 年 1 月 19 日《广东群报》

《红楼梦》新叙

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

我们中国历来私人的历史家很少，留心记载当时历史材料的历史家更少；因此，我们要研究前代社会状况，读小说往往好过读历史。但是这种小说家兼任历史家的习惯，终是小说、历史两方面发达底障碍。

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的好现象。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

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材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底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的《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传品中代表著作。

一九二一年四月叙于广州看云楼

原载，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1 年 5 月 5 日出版《红楼梦》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刮刮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

文化运动底内容是些什么呢？我敢说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

社会运动底内容是些什么呢？我敢说是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人口问题这一类的事。

这两类事底内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们混为一谈，岂非怪事吗？

文学、美术里面，也许有人喜欢加上一点社会化的色彩，描写到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也许要很留意文学、美术、哲学、科学做他们社会运动底工具；但这两类事业底本身，仍然是两件事，不可并为一谈。或者有人一方面从事文化运动，一方面又从事社会运动，这只能说一个人兼做两类的事，不可说这两类事是一类。

有一班人以为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其实大大的不然；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

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又有一班人以为社会运动就是文化运动，这更是大错而特错；试问妇女问题、劳动问题，在文艺、科学上有何必然的连带价值？并不是我们看轻了社会运动，只因为他和文化运动是两件事，我们不能说在社会运动有成绩的人在文化运动也有成绩，也和我们不能说在文化运动有成绩的人在文化运动也有成绩是一样。以上两种人的误会，都因为不明白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

又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若再进一步，连军事也拉进去，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

政治、实业、交通，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他们发达而发生的，不能说政治、实业、交通就是文化。这个道理罗素在北京演讲的《社会结构学》里面有一段说得很清楚，现在录在下面：

“什么叫做文明，其定义可以说是要求生存竞争上不必要之目的——生存竞争范围以外之目的。古代文明，第一次发原于埃及、巴比伦大河出口之处，地土膏腴，宜于农作，由农业发生文明，……在膏腴的地方，如长江、黄河底下游，一人工作出来的不止供给一人底需要，于是少数人得着闲暇，可以从事知识思想的生活，如文字、算术、天文等，均为后世文明底基本。但在这时候虽有少数人从事文明事业，其大多数人作工还非一天到晚劳苦不可，科学、哲学、美术固然也有人注意，但只是少数幸运的人。在实业发达时代，生产必需品既然增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人只要每天四小时作工，余剩的就可以从事

知识思想的生活了。”

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决不是短时间可以得着效果的事。这几年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底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毛，那责备文化运动底人和以文化运动自居底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轻了。

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竟然说出“文化运动已经有两三年了，国家社会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的话，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么。

原载 1921 年 5 月 1 日《新青年》9 卷 1 号

告 劳 动

劳动诸君，你们的困苦你们自己都知道，不用我说了。你们的困苦也决不是枝枝节节可以解决的，现在要紧要奉告诸君的，就是各地方各行业之劳动都必须知道必须遵守的两条大义。

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粮食是诸君种的，布帛是诸君织的，衣服是诸君缝的，房屋是诸君盖的，矿山是诸君开的，一切车船机器无一不是诸君造的，全世界的东西都由诸君做成，全世界的权柄都应该归诸君执掌。现在诸君却为什么还这样困苦呢？诸君知道诸君的困苦是从那里得来的吗？不用说了，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土地、机器、房屋那等生产工具都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了，诸君要做工糊口，而没有土地、机器、房屋等工具，所以不得不把力气卖给资本家做他的雇工。资本家给雇工的工钱仅够糊口度命，其余大部分利益都归到资本家的荷包，因此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诸君的困苦就是从这里来的。诸君想要免除困苦，非把资本家私有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改归劳动界大家公有不可。这件事却不是少数劳动可以办得到的，并且不是一些主张不同、方法不同、各个自由奋斗的散漫团体可以

办得到的。必须各行业各地方之劳动都觉悟到各行业的雇主资本家是一个阶级，各行业被雇的劳动是一个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害是永不相同的。资本家阶级组织了政府国会，有了这些权力，所以才能够压制劳动，所以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劳动向来没有组织，不能团成一个阶级，所以显不出你们的威力，所以才永远是困苦的雇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方各行业的劳动组织成一个阶级，决没有反抗组织强大的资本阶级的力量。没有反抗资本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工具夺归劳动界公有。生产工具不归劳动界公有，劳动的困苦决不能免除，这就叫作阶级的觉悟。

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自古到今，所有的国家、政府、国会，都是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组织的，与劳动平民没有关系，所以劳动平民的困苦，他们向来不闻不问。这也怪不得他们，只怪劳动自己没有阶级觉悟，没有能力建设自己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来解决自己的困苦。减少工作时间自然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时间虽然减少，若是工作上加增了烦重，仍和不曾减少时间一样。加增工钱自然也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物价跟着工价涨了起来，仍和不曾加增工钱一样。所以这等枝枝节节的要求，决不是免除劳动困苦之根本方法。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方各行业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决不能解决劳动界困苦，劳动界决不可依赖他们，所可依赖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劳动革命军。

原载 1921 年 6 月 7 日《共产党》第 5 号

卑之无甚高论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

罗素离中国最后的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面说，“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不彻底，更要责备他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反背了。我独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他又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提倡少数人专政。我也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

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

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底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种事实决不是高论能够掩住使我们可以不承认的。

吴稚晖先生说：“现在只好令列宁杀了我们，然后我们再杀列宁。”我想吴先生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不专为老腐败而发，也并为一般自命为觉悟的青年而发。

可怜我们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逼迫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

我希望不愿意民族的自杀之人，勿闭起眼睛妄发不认事实、自欺欺人的高论！

原载 1921 年 7 月 1 日《新青年》9 卷 3 号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只可以改造变形，要说人类可以绝对不要政治，这话此时还没有证据。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政党只可以改造，要说政治可以绝对不要政党，这话此时也还没有证据。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似乎都算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究竟多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

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有人说，在有资产阶级的政治之下，由金力造成的政党，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是无法改造的，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

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

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而又不象欧美人做机械的奴隶。”又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

罗素这两段话，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

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原载 1921 年 7 月 1 日《新青年》9 卷 3 号

答 蔡 和 森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和森先生：

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

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

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

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

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先生以为如何？

此理说来甚长，我这不过是最简单的解释，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独秀 一九二一，八，一。

原载 1921年8月1日《新青年》9卷4号

平民教育

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所以连贵族的教育我也不反对，而况且在教育极幼稚的中国。话虽如此说，而我们希望教育界有由贵族的到平民的的趋势。在工业未发达的社会里希望教育发达，自然是妄想，在社会主义未实现的社会里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自然也是妄想；但是在工业幼稚的资本制度之下能有少数的学校倾向平民主义，却也未尝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我对于教育的意见，第一是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象是原料不是制品；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因为资本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料，却是商品。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最盛的地方，教育也相当的发达起来了，但所有的男女教育是不是制造商品，却待大家扪心自思，我也不忍妄说，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原载 1922 年 11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之《独秀文存》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但是今天只讲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精神，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理，在马克思纪念册上叙述了，诸君都可见到。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怎样叫实际研究的精神！说来很为繁杂。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什么叫演绎法？就是以—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什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个原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

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这便是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

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

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我望青年同志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我今天特讲马克思这两大精神，请诸君注意。

原载 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人类社会因治生方法不断的进步，他们经济的及政治的组织遂随之不断的进步。在这不断的进步之过程中，保守者与改革者亦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两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断的争斗；每个争斗的结果，后者恒战胜前者，人类社会是依这样方式进步的。照前人依据历史的事实指示我们的：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即不断的争斗中，依治生方法之大变更扩大了他们的生活意识，他们利害相冲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两次最大的阶级争斗，第一次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第二次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所以人类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争斗，都有阶级争斗的意义含在里面。

今日，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方在猛烈的进行中，即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虽在最进步的国家若德意志若法兰西也还未曾完全终了。在产业幼稚的东方，除游牧的民族不计外，即稍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都十分幼稚，因此国家统治权仍旧完全掌握在封建阶级之手；最进步的日本，也不过是一个半封建式半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已战胜封建的欧美资产阶级，采用帝国主义，积用产业不发达的亚洲、非洲诸国做他们的殖

民地或商场,并且公然的或阴谋的运用他们政治及经济势力,钳制殖民地及商场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都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这是非、亚两洲被压迫的民族之普遍的痛苦。

在这种世界政治的经济的状况之下的中国,他也是被压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经济是自然要受环境支配的。

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因为受了列强在中国所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本国军阀的扰乱,农民被物价腾贵驱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业渐为外国机器制品所毁灭,新兴的工商业没有保护关税及运输便利,也不能够发展起来和外资竞争。

中国政治的状况,也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操诸外人之手,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二)是国内军阀的扰乱,帝制倒了,帝制遗下来的军阀却未曾倒,大小军阀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权、财权,使全国中法律无效,舆论无效,财政紊乱而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军阀互斗之故,战祸遍于全国,金融恐慌,运输停滞,工商业莫由发展;(三)是政党之羸弱,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羸弱,这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征。孤军奋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的历史,但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至其余的党派,都不过凑合数百个或数十个利害相同的官僚议员,依

附军阀来谋一官半职，我们不敢妄说他们是有主义、政策的政党。

以上所列中国经济的及政治的现状，凡是诚实不肯自欺欺人的人，都应该承认是如此。

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斗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潜势力，虽然是无限的伟大，但是他们阶级的形式及知识方在萌芽时代，所以他们所表现的，只是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可以说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时期还未成熟；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已经由辛亥革命运动爱国运动及护法运动表示他们的意志了。所以第一段斗争，是中国人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劳苦群众也都应该加入，因为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斗争，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

因此，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现状之下，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斗争，应该以左列诸项原则为最重要的标的：

(一) 倾覆军阀及卖国党，尤其首先要惩创勾结卖国党或希图割据的军阀，以实现国内和平与本部统一。

(二) 废止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收回管理权，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三)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绝对的自由权，

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四) 定保护农民工人的各种法律。

用如何方法达到上列各项标的，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的民主政治的标的，固然不是在维持现状之下，利用敌人势力鼠窃狗偷可以达到，也不是小势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为一切国家都必然建设在权力之上，封建的国家建设在军阀权力之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人民权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殖民地的国家建设在母国权力之上，无权力则无国家无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这种自然法则之支配，又是我们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若是人民的权力不能代替军阀的权力，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民主政治是不会成功的。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关键，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主张干涉政治而不主张组织政党，更是发昏之发昏。要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权力来代替军阀权力，非有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党二个以上不可。因为有这们多的党员，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才可以实施刷新政治的各项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这件事若办不到，政党政治是不会成功的，民主主义是不会实现的，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军阀政治不倒，他们各霸一方把持财政，法律无效，舆论无效，战乱蔓延，工商凋敝，教育废弛等现状，是要继续下去的。此等现状继续下去，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现在半殖民地状况更变到完全殖民地状况的。

我们知道民主主义的争斗仅是第一段争斗，不是人数最后的争斗；我们更知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下的政党政治是必然包涵许多腐败与罪恶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人类阶级争斗亦即社会进步的过程上看起来，在中国政治的及经济的现状上看起来，我们势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腐败更罪恶的军阀政治之民主的政党政治能够成功。

现在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那里。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说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我们本不反对，但是要晓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镇乡的自治，地方自治团体扩大到中国各省这样大的范围，已经不是简单的地方自治问题，乃是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问题了。

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们这种主张，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实上，无人敢说这样大的自治权马上就能够归到人民手里，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增长乱源的政治主张，我希望爱国君子要

慎重一点。

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原载 1922 年 6 月《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号

马克思学说

(一) 剩 余 价 值

马克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的学说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亚当·斯密代表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一样，在这一点无论赞成马克思或是反对者都应该一致承认。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覆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亚当·斯密也曾说过：“在土地未私有资本未集聚的最初状态，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全属劳动者自己所有。”（见《原富》一卷六六页。）又说：“劳动者自己享有全部生产品的最初状态，土地私有资本集聚之后便不行了。”（见《原富》一卷六四页。）这两段明明说因为土地和资本私有底缘故，劳动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产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归了何人呢？照马克思底学说，这就叫做剩余价值，是归了资本家底荷包，资本家夺取了劳动者底剩余价值，做为他私有的资本，

再生产再掠夺，以次递增，资本是这样集聚起来的，资本制度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话虽这样简单，但是要真实明白剩余价值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实现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烦难的事，现在不得不略略说明一下。

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者，对于凡物之价格都分为自然价格 (Natural Price) 市场价格 (Market - Price) 两种。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我们千万不可弄错。劳动价值也分二种：(一) 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 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这两种劳动价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马克思底意思是说：凡两件货物互换，这两件货物一定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换若干面粉，这两样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为劳动所作的结果；因此所费劳动相等的货物价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时做成的货物，价值比用六小时做成的货物高一倍，一个茶碗价值二角，一个茶壶价值一元，壶底价值比碗大四倍，是因为做壶所用的劳动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用劳力所制造的商品（就是货物）之价值，乃是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分量，就是劳动时间长短的意思。社会的劳动，是与个别劳动不同的意思；个别劳动有个别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异，所谓社会的劳动，是指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下，将这些个别的差异都作为平均程度，因此社会的劳动也叫做平均的劳动。）劳动者把劳动力卖

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底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马克思所谓制造一切商品所费的劳动分量，乃是兼“生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费的劳动）和“死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用原料、工具、建筑等以前所费的劳动）二种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马克思的价值及劳动价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说，以下再说剩余价值是什么。

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说详细一点，常分为剩余价值之成立及剩余价值之实现和分配二部分：

剩余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这个意思十分重要，我们也千万不可弄错。此话怎讲？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虽然要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际归到资本家底荷包，但是夺取底方法和剩余价值底本质，都不是指流通过程中一件一件生产产品的卖价，乃是指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做“剩余劳动”的价值。“剩余劳动”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近代利用机器，制造业底规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产比机器的生产产品货色不好价钱又贵，因此手工业一天衰败似一天。于是由手工工业时代变了机器工业时代，由家庭工业时代变了工厂工业时代，由独立生产时代变了共同生产时代，这就叫作“产业革

命”。自产业革命以来，所有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矿山、房屋、机器、原料等）都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以外的人，除了将自身底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费用。资本家给他们多少生活费用（即工钱）呢？照马克思的价值公例，一切商品之价值常与制造此商品时所费的劳力相等，劳力（也是一种商品）之价值（即工钱）也常与培养这劳力所需的劳动（即制造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劳动）相等。那么，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的劳动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生活品的价值；然而资本家往往要劳动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所给工钱只值六小时的生活品，其余六小时，在实际上劳动者未曾得着工钱，是替资本家白做了，这白做的六小时就叫作“剩余劳动”。生产品之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者做出来的，而劳动者所得只一部分与六小时劳动价值相等的工钱，其余一部分由六小时剩余劳动而生的价值，就叫作“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和分配的呢？剩余价值虽然成立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必须到了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产出一定价值的货物，剩余价值的本质及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底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譬如一资本家费价值五成的劳动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这时剩余价值五成固然已经由剩余劳动五成在生产过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将棉纱卖给消费者，将价值十成的货物变成价格十成的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那时五成剩余价值才算实现了。这是因为生产者不能将货物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中间必须经过贩卖者之手，贩卖者须得一定资本及劳

力之报酬,于是生产者不得不在价值以下的价格卖出他的货物。譬如用价值五成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因为贩卖者之报酬,价值十成的棉纱至多只能卖得价格八成的货币,因此五成剩余价值中,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余二成是归了贩卖棉纱的资本家,制造棉纱的资本家若是问他资本家借过资本,便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他资本家的利息;纱厂底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地租。剩余价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种资本家分配所余才是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实际得着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

资本家底资本是夺取劳动者剩余价值变成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之价值变成的;工作时间越长,剩余劳动越加多;工钱越少,剩余劳动也越加多;出产能力越高,剩余劳动也越加多。所以资本家想扩张剩余价值,天天在那里提高出产能力,天天在那里反对增加工钱、反对减少工作时间,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又拿货币制造商品、增加剩余价值,再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如此利上生利,这就叫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营业底规模一天大过一天,掠夺兼并底规模也一天大过一天,加上交通机关一天便利过一天,殖民地新市场一天扩大过一天,精巧的机器一天增多过一天,大银行大公司便一天发达过一天,从前的小工业都跟随着这些制度之发展,逐渐被大工业吸收了压倒底结果,便是把全社会的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叫作“资本集中”。在从前小工业时代,资本不集中,因此产业不能发达,所以资本集中使生产能力增加产业规模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好过以前的生产方法只在这一点。但是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会的

财产大部分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便自然发生以下各项结果:

(一) 无财产的佣工渐渐增多;(二) 生产能力增加而无产佣工的购买能力不能随之增加,因以造成“生产过剩”的结果,生产过剩又必然造成“市场缩小经济恐慌”和“工人失业”两种结果。合起这几项,结果,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们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的团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

象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怎样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怎样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怎样造成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怎样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在马克思学说里叫作“经济的历史观察”,又叫作“唯物物的历史观察”。

(二) 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三种书里都曾说明过这项道理。综合上列三书中所说明的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

其一 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

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 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涵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

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斗争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马克思底好友恩格斯曾述说马克思的意见道：“在历史各时代，必然有他的生产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这种特殊方法造出一种社会制度，那时代的政治和文明之历史，都建设在那个基础上面，依据那个基础说明。所以人类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是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和被压制阶级对抗的历史。这些阶级斗争的历史相连相续，构成社会进化之阶级，到了现在又达到一种新阶级，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即无产劳动者）要脱离掠夺压制阶级（即绅士、军阀、资本家）的权力，将自己解放出来；同时还要将一切掠夺压制和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完全铲除，永远把社会全体解放出来。”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把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打成一片了。

（三）阶 级 争 斗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斗争的。其中要义有二：

（一）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例如在古代有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这些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自来都是站在反对的地位，不断的明争暗斗。封建废了，又发生了近代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两个阶级新的对抗，新的斗争。

（二）阶级之成立和斗争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例如欧洲在封建时代的工业组织之下，生产事业是由同行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发见了印度、中国等市场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时候，便不能应付新市场需要底增加了，于是手工工场组

织应运而生，各业行东遂被工场制造家所挤倒，接着市场日渐扩大，需要日渐增加，交通机关和交换方法都日渐发展。这时手工工场组织也不能应付了，于是又有蒸汽及大机器出来演成产业革命，从此手工工业又被大规模的近代产业所挤倒，近代的有产阶级便是这样成立的。近代产业建设了世界的市场，有了这些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都跟着发达，这些发达又转而促进产业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这样发达，有产阶级也跟着照样发达，资本越加多，产业越扩大，将中世纪留下的一切阶级都尽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产阶级乃是长期发达和生产及交换方法迭次革命底结果。由此可知做有产阶级基础的生产和交换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生产和交换方法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即农业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适合，这种制度便成了生产力底障碍物，便必然要崩坏，结局果然崩坏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竞争的制度代之而兴，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也就跟着出现，有产阶级底经济及政治权力也就跟着得到了。有产阶级得势以后，造成了极雄大惊人的生产力（象工业、农业、轮船、铁道、电报、运河等），惹起这般大规模生产及交换的社会，将人口、财产及生产机关都集中了，建设了许多都市，将乡村人口移到都市，使乡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数人民脱离了朴素的乡村生活，使野蛮和未开化国屈服于文明国，农业国屈服于工业国，东洋屈服于西洋。但是到了有产阶级底生产力发展到了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不适合的时候，社会制度就成了社会生产障碍物，有产阶级及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坏的。崩坏底征兆就是商业上的恐慌，这种恐慌隔了一定期间便反复发生，一回凶过

一回，常常震动有产阶级社会底全部。这恐慌发生底缘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是由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过于狭小，不能包容那过于发展的大生产力。有产阶级救济这种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开辟新市场，一面尽量剥削旧市场，这只能救济一时，终是朝着更广大更凶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

有产阶级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还培养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这些人就是近代的劳动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跟着有产阶级照同一的比例发达起来的，近代产业发展的结果，一般小资产的小商人小工业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能为新生产方法所压倒，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为大规模的产业所压倒，都不断的降到无产阶级，可是一方面产业愈加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不但人数愈加增多，而且渐次集中结成大团体，因为生活不安，对于有产阶级渐次增长阶级抵抗底觉悟，发生争斗，始于罢工，终于革命。有产阶级存在根本底条件，是在资本成立及蓄积；资本底重要条件，是在工钱制度；工钱制度，全靠劳动相互竞争。但有产阶级既已促进了产业进步，便已经使劳动者从竞争的孤立变成协力的团结了；近代产业发达，使有产阶级的生产及占有之基础从根破坏；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马克思说明阶级争斗大略如此，我们实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观有矛盾的地方。

(四) 劳工专政

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得了政权，没有不拼命使社会屈从他们的分配方法，巩固他们已得的地位。

“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政治上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自他们成为有产阶级后，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一手把持。

“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

“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为支配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

“原来政权这样东西，不过是一个阶级压制一个阶级一种有组织的权力；劳动者和资本家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织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支配阶级的地位，不得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兰西内战》里说：

“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达纲领批判》里说：

“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

原载 1922 年 7 月 1 日《新青年》9 卷 6 号

《独秀文存》自序

亚东主人将我近几年来所做的文章印行了。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剿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既有出版的价值，便应该出版，便不必说什么“徒灾梨枣”等客套话。

一九二二年八月，独秀自序于上海。

原载 1922 年 11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之《独秀文存》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

我们一方面天天骂军阀官僚包办政治败坏国家，一方面却又天天主张我们不干预政治，这种思想是何等矛盾！中国社会向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士人（教育界属之）说：我们只要专心办学求学，不必问政治；农民更在那里睡觉，连政治这个名词还不大知道；工人说：我们只求改良生活，我们不愿干预政治；商人也说不谈政治。好了，士、农、工、商都不问政治，有个国家又不能没有政治，如此政治只得让军阀官僚来包办了。因此，我们敢说：中国政治坏到现在这样地步，不是军阀官僚自己要包办政治的罪恶，乃是士、农、工、商都放弃责任而且忍心害理的主张不问政治，甘心让军阀官僚包办的罪恶。单就教育界的士说，政治不清明，财政紊乱，教育费无着，你们如何能办学，求学？于是你们妙想天开的说：教育独立，不问政治。我现在要问：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我又要问：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有何力量可以保证不被军阀拿去？若无人圆满的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希望“教育独立，不问政治”这种毫无常识的话，勿再出诸知识阶级的教育家及学生之口！现正有些人

对于学生请愿被殴风潮又说：我们只主张教育独立、司法独立及驱彭，不干预政治。其实教员学生除了教书读书以外，出来主张教育独立，主张司法独立，主张驱彭，也都是些政治运动了，还说不干预政治，真是掩耳盗铃。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人是政治的动物”，除非不是人，那能够不问政治！“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是中国人安心不做人的表示！

原载 1923 年 1 月 31 日《向导》第 18 期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死的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除了少数知识阶级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饭穿衣生儿子的行尸走肉。现在这班行尸走肉，比较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更要沉睡过去，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这班青年学生愈为一班行尸走肉所厌恶，他们的责任愈加重大呵！

行尸走肉的老废物不用说了，现代的青年们，一部分教会学生被教会教育泯没了性灵与爱国心，简直没有希望了，一般官僚的子弟，把学校和科举同样看待，也算是一些活的死人；又有一班将要醒觉的青年，却被老庄哲学或什么东方文化引到睡眠状态去了；更可怜的是一种半醒觉的男女青年，妄以个人的零碎奋斗可以解决他生活和恋爱问题之困难，此路不通，便由烦闷而自杀或堕落的亦往往有之。真正醒觉挺身而出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

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的，这是何等危险！

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他的特性：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摇动，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

向革命。

德国、俄国的青年在革命运动中，都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社会更有特殊状况，幼稚的各社会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他责任的轻重，与欧、美、日本的学生迥然不同。

中国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做，第一要明白他责任重大，而不可自弃，这是因为国民中只有学生比较是醒觉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

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两点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和欧美的学生界不同的地方。

原载 1923 年 10 月 20 日《中国青年》第 1 期

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

贫学的中国，翻译外国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于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若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便没有译成外国文的可能了。

由此观察，此时出版界很时髦似的翻译泰戈尔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欢迎他的艺术吗？无论如何好的艺术品，译成外国文便失了技术上的价值；即令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欢迎他著作的内容即思想吗？象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戈尔？

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原载 1923 年 10 月 27 日《中国青年》第 2 期

《科学与人生观》序

亚东图书馆汇印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无事，却很欢喜的做这篇序。第一，因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文化落后的俄国前此关于这问题也有过剧烈的讨论，现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进了步，稍懂得一点社会科学门径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无常识的讨论了，和我们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不至于讨论什么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电线是不是蜘蛛精这等问题一样。）而却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勱、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寿康先天的形式说，及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说）。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勱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敌人方面却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出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这方面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我以为不但不曾得着胜利，而且几乎是卸甲丢盔的大败战，大家的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象是

“科学概论讲义”，不容易看出他们和张君劢的争点究竟是什么，张君劢那边离开争点之枝叶更加倍之多，这乃一场辩论的最大遗憾！第二，因为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这两个缘故，我很欢喜的做这篇序。

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和人生观有什么关系，这问题本不用着讨论。可是后来科学的观察、分类说明等方法应用到活动的生物，更应用到最活动的人类社会，于是便有人把科学略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类。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这些社会科学，不用说和那些自然科学都还在幼稚时代，然即是幼稚，已经有许多不可否认的成绩，若因为还幼稚便不要他，我们不必这样蠢。自然科学已经说明了自然界许多现象，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科学已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自然界及社会都有他的实际现象。科学家说明得对，他原来是那样；科学家说明得不对，他仍旧是那样；玄学家无论如何胡想乱说，他仍旧是那样；他的实际现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来在那里绕日而行，孟轲以后，渐渐变成了无君的世界；科学的说明能和这死板板的实际一一符合，才是最后的成功。我们所以相信科学（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也就是因为“科学家之最大目的，曰摈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现象化之为客观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穷其因果之相生”（张君劢语），必如此而后可以根据实际寻求实际，而后可以说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死板板的实际，和玄学家的胡想

乱说不同。

人生观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很显明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讨论？哈哈！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之本身，也可以证明人生观和科学的关系之深了。孔德分人类社会为三时代，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象张君劭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象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这种社会的实际现象，想无人能够否认。倘不能否认，便不能不承认孔德三时代说是社会科学上一种定律。这个定律便可以说明许多时代、许多社会、许多个人的人生观之所以不同。譬如张君劭是个饱学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尝学问的家族要去求符咒仙方，张君劭立意要延医诊脉服药；他的朋友丁在君方从外国留学回来，说汉医靠不住，坚劝他去请西医，张君劭不但不相信，并说出许多西医不及汉医的证据；两人争持正烈的时候，张君劭的家族说，西医、汉医都靠不住，还是符咒仙方好。他们如此不同的见解，也便是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都是他们所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天外飞来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决不是形而上的玄学可以说明的。

张君劭举出九项人生观，说都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而不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学所支配。今就其九项人生观看起来：第一，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纯粹是由农业经济宗法社会进化到工业经济军国社会之自然的现象。第二，男女尊卑

及婚姻制度，也是由于农业宗法社会亲与夫都把子女及妻当作生产工具，当作一种财产，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手工已不适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拿家族当生产工具，于是女权运动自然会兴旺起来。第三，财产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产社会，人弱于兽，势必结群合作，原无财产私有之必要与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单一性的张先生，生在那个社会，他的主观，他的直觉，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财产私有起来，怎奈他所得的果物兽肉无地存储，并没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变卖金钱存在银行，结果恐怕只有放弃他私有财产的人生观）；到了农业社会，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仓库，谷物又比较的易于保存，独立生产的小农，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没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到了工业社会，家庭的手工的独立生产制已不能存立，成千成万的人组织在一个通力合作的机关之内，大家无工做便无饭吃，无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没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已为少数资本家私有了，非将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大家只好卖力给资本家，公有财产观念，是如此发生的。第四，守旧维新之争持，乃因为现社会有了经济的变化，而与此变化不适应的前社会之制度仍旧存在，束缚着这变化的发展，于是在经济上利害不同的阶级，自然会随着变化之激徐，或激或徐的冲突起来。第五，物质精神之异见，少数人因为有他的特殊环境，一般论起来，慢说工厂里体力工人了，就是商务印书馆月薪二三十元的编辑先生，日愁衣食不济，那有如许闲情像张君勱、梁启超高谈什么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第六，社会主义之发生，和公有财产制是一事。第七，人性中本有为我利他两种本能，个人本能发挥的机会，乃由于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之不同而异。第八，悲观、乐观见解之不同，亦由于个

人所遭环境及所受历史的社会的暗示而异，试观各国自杀的统计不但自杀的原因都是环境使然，而且和年龄、性别、职业、季节等都有关系。第九，宗教思想之变迁，更是要受时代及社会势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教，依据所传神话，大都是崇拜太阳、火、高山、巨石、毒蛇、猛兽等的自然教；后来到了农业经济宗法社会，族神祖先农神等多神教遂至流行；后来商业发达，随着国家的统一运动，一神教遂至得势；后来工业发达，科学勃兴，无神非宗教之说随之而起；即在同一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产业进化之迟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随之而异，非洲、美洲、南洋蛮族，仍在自然宗教时代，中国、印度，乃信多神，工商业发达之欧美，多奉基督；使中国圣人徒生于伦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颂耶和华；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国穷乡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与狐狸。以上九项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

梁启超究竟比张君劭高明些，他说：“君劭列举‘我对非我’之九项，他以为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梁启超取了骑墙态度，一面不赞成张君劭，一面也不赞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见是：

“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他所谓大部分是指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他所谓一小

部分是指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他说：“既涉到物界，自然为环境上——时间空间——种种法则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项，固然不离物界，难道情感方面事项不涉到物界吗？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应，情感如何而起，这都是极普通的心理学。关于情感超科学这种怪论，唐钺已经驳得很明白。但是唐钺驳梁启超说：“我们论事实的时候，不能躐入价值问题。”而他自己论到田横事件，解释过于浅薄，并且说出“没有多大价值”的话，如此何能使梁启超心服！其实孝子割股疗亲，程婴、杵臼代人而死，田横、乃木自杀等主动，在社会科学家看起来，无所谓忧不忧，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无所谓有价值无价值，无所谓不可解，无所谓神秘，不过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应有之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乃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传说及一切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试问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这样举动，有没有这样情感，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意志？

范寿康也是一个骑墙论者，他主张科学是指广义的科学，他主张科学决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他说：“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决不是主观所应妄定。”他所谓先天的形式，即指良心命令人类做各人所自认为善的行为。

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一个人生在印度婆罗门家，自然不愿意杀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长家，自然以多杀为无上荣誉；一个女子生在中国阀阅之家，自然以贞节为他的义务，他若生在意大利，会以多获面首夸示其群；西洋人见中国人赤膊对女子则骇然，中国人见西洋人用字

纸揩粪则惊讶；匈奴可汗父死遂妻其母，满族初入中国不知汉人礼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为耻；中国人以厚葬其亲为孝，而蛮族有委亲尸于山野以被鸟兽所噬为荣幸者；欧美妇女每当稠人广众吻其所亲，而以为人妾为奇耻大辱；中国妇人每以得为贵人之妾为荣幸，而当众接吻虽娼妓亦羞为之。由此看来，世界上那里真有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我现在举出两个证据：

第一，他自号存疑的唯心论，这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此所以张君劢说：“既已存疑，则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学，不应有丑诋之词。”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说我们武断也好，说我们专制也好，若无证据给我们看，我们断然不能抛弃我们的信仰。

第二，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科学与物质文明，固然是十分糊涂，但丁在君把这个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离开事实太远了。欧洲大战分明是英德两大工业资本发展到不得不互争世界商场之战争，但看他们战争结果所定的和约便知道，如此大的变动，那里是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制造得来的。如果离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排科学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够造成这样空前的大战，那末，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君劢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真有力量了。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

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象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原载 1923 年 11 月 13 日《新青年》(季刊)第 2 期

精神生活 东方文化

我们不是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我们不是迷信欧洲文化以为极则,我们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欧洲文化更为幼稚。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二万万人不能由正当手段得着衣、食、住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有何心肝来高谈什么精神生活。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三万万人不认识我们这倒运的象形字,还有何脸面来高谈什么东方文化。我们若把精神生活当作神圣,把物质生活当作鄙陋,个人贫苦事小,一群贫苦事大;不但贫苦而已,而且因此辜鸿铭一班人,硬说中国人不爱清洁正是重精神轻物质的美德。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思想、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

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我虽不认识张君勱,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溪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梁漱溪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不用说这康庄大道也有许多荆棘须我们努力砍伐)走,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更有一位浑沌不过的浑沌先生他在《东西文化到底能够融合吗》那篇论文(见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栏)里说:“梁先生不知道中国化是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世界未来之文化即是中国化,而中国化成为世界文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变迁了。”“虽然在大都市里与知识阶级里有禁不起西方化的诱惑而投降的,但在大部分的农民,仍旧勤恳地种着田,纯朴而且自然,仍旧无思无虑的过那孔老的生活,一些儿没有变动,只待西方化、印度化来到他们的中国化面前低头。”他又分析东西文化不同之点是:西方人全靠自己的力满足欲求,印度人全靠神的力满足欲求,中国人没有欲求。这位浑沌先生真算名称其实了!他有何证据断定中国人没有欲求?由古之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一直到今之饮食、衣裘、车马、客室,不是欲求是什么?他怀着西方化来到农村向中国化低头的幻想,他不看见西方化来到中国农村驱遣无数农民去而为匪为兵的事实!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的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这位浑沌先生还做着梦说:“一些儿没有变动”。我不知道梁漱溪

先生也认他是走一条路的同志吗？

原载 1924 年 2 月 1 日《前锋》第 3 号

国 学

曹聚仁先生说：“我们的社会，毕竟建筑在东亚大陆上，社会中各个体，毕竟要受旧文化的影响，一切思想决不能离了历史独自存直的。”他这段话我完全赞成，他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古董学问，纯粹是把他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必要，尤其是在社会学与考古学。但是用这样精神去研究他，只可称他为“国故”或“中国学”，而不可称他为“国学”；因为国故与中国学，都只表示历史材料的意思，而“国学”便含有特别一种学问的意思。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

原载 1924 年 2 月 1 日《前锋》第 3 号

泰戈尔与东方文化

泰戈尔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藪,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和平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见四月十四日《申报》泰戈尔与中国新闻记者谈话)

在这一段谈话中,中国新闻记者倘无误记,我们可以认识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也不必比较的讨论相杀残破的西方文化和生焚寡妇(如印度)、殉节阉宦(如中国)的东方文化孰为健全;现在所要讨论的是:泰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这些思想文化复活后,社会上将发生什么影响,进步或退步。

(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认这是东洋固有的思想

文化 ,并且现在还流行着支配社会 ,尤其是在中国 ,有无数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他的拥护者 ,他并没有死 ,用不着泰戈尔来提倡令他复活。若再加以提倡 ,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 ,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 ,不但禁止男女同学 ,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 ,禁止男女同乘一辆火车或电车。

(二)知足常乐 ,能忍自安 ,这也是东洋独特的思想。在泰戈尔的意中 ,以为正因东洋有这种高妙的思想 ,所以胜过西洋不知足而竞争 ,不能忍而不安的社会。殊不知东方民族正因富于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隶的和平思想 ,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手啖饭的生活 ,中国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 ,而知足常乐 ;所以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

(三)轻物质而重心灵 ,泰戈尔也以为是东洋文化的特色。其实中国此时物质文明的程度简直等于零 ,反之努力提倡心灵思想文化的人 ,头等名角如唐焕章、江神童 ,二等名角如梁漱溟、张君勱 ,其余若同善社社员 ,灵学会会员已普遍全国 ;泰戈尔若再要加紧提倡 ,只有废去很少的轮船铁路 ,大家仍旧乘坐独木舟与一轮车 ;只有废去几处小规模机器印刷所 ,改用木板或竹筒。

泰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 ,倘只是抽象的空论 ,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 ,请不必多放蕪言乱我思想界 !泰戈尔 !谢谢你罢 ,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 !

原载 1924 年 4 月 18 日《中国青年》第 27 期。

留 美 学 生

美国限制移民律 ,竟影响到中国赴美的留学生 ,以至未动身的不能动身 ,已动身的到了美国不能登岸 ,在普通感情上 ,我们应该愤恨美国 ,然而我却十分感谢美国。因为在一般留美学生成绩上看起来 ,几乎无一人不反对革命运动 ,几乎无一人不崇拜金钱与美国 ,这种人少一个好一个 ,若是美国简直不许一个中国人去留学 ,那才是为中国造福不浅 !

原载 1924 年 8 月 6 日《向导》第 77 期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工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固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

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即或义和团当中及纵容义和团之贵族夹有思想上政治上争执的动机或其他更卑劣的动机，而群众之附和义和团，则由于外力尤其是教会压迫的反应，可以说毫无疑问。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你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

气,我都亲身经历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原载 1924年9月3日《向导》第81期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近来英美人士极口称赞这位基督将军的军队如何优良，青年政治家基督教徒王正廷等如何为冯玉祥奔走联络，这都是新工具登场的广告。

这次英美更换新工具，乃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势力均衡（英美不能完全打倒日本在华势力，日本对英美亦然）和中国军阀势力均衡（直不能完全平奉，奉亦不能完全平直）之故；他们的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即政变中所传天津会议），并由此会议产生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各派军阀（或加入一二财阀？）首领合作之委员制的政府。

我们百口断定这种结局，不但决不能解决中国的纠纷，而且必然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随后他们当中又必然互相争斗起来，加中国人民以空前的屠杀与践踏。

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呵！自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中国的经

济权政治权都渐渐落在帝国主义的列强手里，我们如何能妄想任何军阀的政治行动不受列强的操纵？我们如何妄想他们给我们吃的任何东西不是毒药而是滋养品？

在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中国人民呵！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凯死了，我们希望段祺瑞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们又希望吴佩孚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结果又失望了；现在曹、吴又倒了，我们若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而且不但失望，譬如毒疮，不施以剧烈的外科手术，弥缝一次，溃烂必更甚一次。

我们与其年年坐着失望，任他溃烂，不如奋起以自力创造和平安定的局面。我们所要的和平安定的局面，决不是什么“排满”、“讨袁”、“讨徐”、“讨段”、“反直”、“讨曹吴”、“讨冯玉祥”可以得着，只有扫荡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可以得着！

原载 1924 年 10 月 29 日《向导》第 89 期

列宁与中国

——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

有许多中国人及其他各国许多人，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以为这个布尔什维克首领列宁，不知是什么一个极恶劣凶的怪物。其实这完全是幻想。列宁的外表，象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象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贮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他不但同情于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指导全世界的阶级争斗，他并且同情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指导全世界的民族争斗。释迦佛说：要普度此世界众生于他世界；列宁说：要为此世界人类中被压迫者脱离被压迫地位于此世界而奋斗。我们若要指证释迦佛所说他世界在何处及超度了多少众生到那里，便未免太滑稽了；而由列宁奋斗所解放之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已经分明在此世界中令我们看见了，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工人、农民之解放及苏联境内小民族之解放与夫近在远东民族革命运动之勃兴。

欧洲人对于远在亚洲东方的中国，或视为不可知的秘密国，或视为一大群未开化民族所聚居的地方，一任其传教师、外交官、远征的军队与商人明欺暗算，而漠然无动于衷。独有同情

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列宁，他对于远在数万里外的中国近代重大事变及在这些事变中所受欧洲各国的欺凌，无不注意到，无不严峻的批准到，他并不宽恕他本国（俄罗斯）政府欺凌中国人之罪恶。

自从义和团事件起，列宁即表示深厚的同情于中国人，攻击他本国政府非常严厉。当时他曾在《火星报》上说：“俄罗斯与中国战争（即指义和团战争）已告结束，为这次战争调动了许多军队……对于那班暴动的中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武装的中国人加以剿灭、弹击，无量数的妇女儿童都被惨杀，其苦何堪！至若农村居民商店之被蹂躏抢劫的状况，更是不用说了。……今日欧洲资本家贪欲的利爪又伸入中国了，且现在力求满足私欲的俄罗斯亦转入这个漩涡之中，并已割据中国的旅顺口，由俄兵保护，在满洲公然建筑铁路；同时欧洲各国政府，相继而起，大家都热心来做抢劫中国的事，冲动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观念，由是将中国的土地，或占据或租借，事实上就等于欧洲各国政府（俄罗斯居其首位）已开始瓜分中国；可是他们瓜分中国不是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而是和暗中偷窃人家坟墓中的死人一样。假若被偷的死人稍有反抗的表示，他们就如猛兽一般，烧毁其村庄，驱逐于海洋，或将赤手空拳的居民和其妻子，枪杀刀杀，毫不加以姑息……如现在报纸（指俄国报纸）又鼓吹兴兵反对中国，加上中国人是‘野蛮黄种’、‘仇视文明’的罪名。……那班无耻的新闻记者，屈服于政府及金钱目的之前，故意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鼓励民众轻视中国。”

列宁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也表示满腔同情，当时他曾在《真理报》上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得到自由了，对于政治生活已经有觉悟了。可以说，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经由沉

睡转到光明、活动、奋斗的路上了。此事对于文明的欧洲是不发生关系的，甚至法国至今还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欧洲这种冷淡的态度，用甚么可以去解释呢！原来在西方各处都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统治，这资产阶级四分之三已经腐朽，对于任何一个野心家，只要争得反对工人之严厉方法及一个卢布有五个戈比的利息，都愿把自己所有的文化卖去。这个资产阶级把中国只不过看成一块肥肉，这肥肉自从被俄国亲热的拥抱一下之后，现在也许要被日本、英国、法国等撕碎了罢！”

列宁对于列强扶助袁世凯造成中国的反动政局，也曾在《真理报》上攻击过：“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掠夺中国，帮助德谟克拉西之仇人，中国自由之仇人。……中国的新外债（是指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反抗中国德谟克拉西的，因为欧洲帮助袁世凯，他原来是预备实行军事专政的一个人。欧洲为甚么帮助他？就是因为可以分点利润。中国借了二万五千万卢布的债……假使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债呢？那时先进的欧洲就要大声疾呼甚么‘文明’、‘秩序’及‘祖国’了！那时就要装着大炮，与野心家黑暗势力的好友袁世凯联合去压迫这‘落后亚洲’的共和国了！”

在列宁这些说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人物，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本国的反动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压迫中国民众破坏中国德谟克拉西运动是何等严酷；同时，又应该看出中国民众之好友，只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无产阶级，那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都是中国反动军阀之好友，也就是中国民众之敌人。

现在全世界人类对垒的形式是：

(甲) 压迫者—— 各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军阀

(乙) 被压迫者—— 各压迫国之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国之民众

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呵！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 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

原载 1925 年 1 月 21 日《向导》第 99 期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章炳麟今夏在苏州什么平坦学社讲学说：“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诚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章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我想听了他这段话的人，不浑身肉麻，便误以为是他自己痛责自己。以一个同盟会会员，首先向张之洞乞怜求援，乞怜不成，又派何震（刘申叔之妻）到端方处运动投降，首先通电说统治中国非项城不可，称孙、黄为小丑，章炳麟的气节安在？王弃比袁世凯总算略识诗书，而且扬雄在王莽朝，也并未曾象章炳麟荣任等边使大摆勋章那样出丑；韩愈固然上书宰相不忘利禄，然而当时的宰相，也还不象现在的什么镇威孚威这样作恶，韩愈更未曾象章炳麟为区区一千元替孙传芳摇旗呐喊，且称孙传芳为神武这样的“廉耻丧失”！

原载 1926 年 10 月 12 日《向导》第 175 期

十月革命与东方

我们要懂得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可忘记了当时的世界情况。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战中，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两方面都只以保卫祖国相号召，独有帝国主义的美国威尔逊举起“打倒德意志军国主义”、“民族自决”这两个旗帜出来号召，颜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自由派和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派，都对威尔逊怀了多少幻想。这时只有无产阶级的首领俄国列宁，他看破了威尔逊的虚伪与无能，他坚决的主张非发起各国国内革命不能打倒军国主义，非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民族自决。其结果威尔逊的巴黎和会，打倒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德意志，救出了英、法、意、比等许多军国主义的国家，民族自决更成了一句废话；列宁的十月革命，却实实在在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伦斯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了芬兰、波兰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之民族自决——独立或自治。这种历史的事实，曾经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列宁和威尔逊之不同，列宁的见解正确而伟大和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都已经不是还有讨论余地的理想了。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有整整的九年，在这九年中，苏俄仍旧是继续列宁的十月革命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

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

欧美资本帝国主义者，知道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对于他们的危险，始而武力对付，继而用经济封锁政策，这两样都不曾收效，现在遂改用吊膀子政策，甜言蜜语劝苏俄“回到西方”。

“回到西方”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抛弃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回向欧美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妥协合作。苏俄内部，近来有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也主张回到西方，他们以为东方民族中，如中国人并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以苏俄援助他们革命为多事，有野心，在另一方面，苏俄却以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结怨于列强，为苏俄自身利益计，应该改变以前政策，停止援助东方民族运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妥协，以便从这些国家中得到苏俄经济发展之物质的援助。苏俄中大多数左派分子却不赞成右派这种意见，以为是违背了列宁的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

当真中国人都并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吗？苏俄中右派分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中国的革命派不用说，就是一般商人，近来也都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并且已经起来做反抗帝国主义之运动，如反抗棉花出口，反抗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纸烟捐和商标，主张关税自主，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主张废止领事裁判权，主张收回会审公堂与租界等，已成了全国商人普遍的运动，而却未曾有一次真正商人反对苏俄，因为在他们的经济生活发展上，天天都感觉到帝国主义者当面的压迫，而不曾感觉受苏俄压迫的事实，真正商人不同流氓政客，因此他们不能无病而呻。中国人中反对苏俄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不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商人、工人、农民，而是一小部分军

阀和无职业的流氓政客如左表：

(一) 军阀；

(二) 军阀的走狗(如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复辟派、国家主义派及民党右派冯自由、章炳麟、徐绍桢、黄大伟等)；

(三) 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洋行买办、耶教徒及民党右派马素、董理璋等)。

这三种反革命派确是不感觉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大叫苏俄援助中国民族革命有野心。然而他们却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与军阀非中国之患，中国大患只是苏俄所援助的国民革命；他们希望力量还弱的国民革命军得不着国内国外任何援助，好让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奉、直军快快打平。他们都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他们反对苏俄援助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军，这也是当然的事。

还有一班人，他们都非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也并不反对苏俄，而他们以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来革命，不一定要依赖苏俄的援助。革命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要依赖外援，这个意见并不错，并且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这样做，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不过若因有苏俄援助可以增加我们革命发展之速度，似乎也没有理由应该拒绝，更无理由因此而反对苏俄。

反对苏俄的人，硬说苏俄援助中国革命是有他的野心，而非善意的援助。说这样话的人，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试问苏俄因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军曾经得到些什么没有？苏俄援助中国，若是由于他的野心而不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

的意义上面，他尽可继续旧俄政策，援助奉天或直系以达到他的野心，又何必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呢？国民革命的势力得胜，能容忍任何国家的侵略野心吗？奉张对俄大使说：“奉、俄近邻，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而帮助很远的广东？”吴佩孚对俄领事说：“我为中俄协定很尽力，我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你们应该来帮助我，派些顾问到国民军那里有什么用？”奉、直军阀并不是不要苏俄帮助，正因为得不着苏俄的帮助才反赤。苏俄为什么不帮助奉、直军阀而帮助国民革命军，这便可以充分证明苏俄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援助中国，而非由于侵略野心。

苏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关系东方被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常重大，可是欧美的资本帝国主义者力劝苏俄回到西方，恰好中国的反革命派也拒绝他来到东方，东方的革命派应该起来怎样对付这个问题呢？

原载 1926 年 11 月 15 日《向导》第 178 期

移步换形的骗术

章宗祥、曹汝霖留学东京时曾说：“我们虽不主张革命，而仍要以流血达到立宪目的。”袁世凯曾说：“我铲除了国民党仍然拥护共和。”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清除共党后仍要做左派反对右倾。”汪精卫、孙科在汉口说：“我们反共后仍然要反帝国主义与讨蒋。”这可算是他们一脉相传移步换形的大骗术。

原载 1927 年 12 月 8 日《布尔塞维克》第 7 期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梦麟先生北返，当已详达鄙状。日来贱躯比梦麟先生到此时更好一点，已能稍稍吃饭与肉了，已能照常写字读书了，特此告慰故人。

审判约在本月底，计尚有月余逍遥。判决后，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牛兰现在即是这样的生活），不象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的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待最后。如果能得着纸笔，或者会做点东西，现在也需要书看以销磨光阴。梦麟先生前曾送来几部小说，惟弟近来对于小说实无丝毫兴趣，先生能找几本书给我一读否？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1931年8月，瑞士共产党人牛兰在上海为蒋介石特务逮捕。（原书注）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先生要责我要求太多了罢！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出版，能够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注音字母这一工具又太不适用，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拙著至浅陋，只是引龙出水的意思而已。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此祝健康！

梦麟、孟真、叔雅、启明、兼士及其他友好，均请代为道念。

弟仲白 十二月一日

回信望寄段书诒兄转下，他常来此探视。

叔雅兄所著《淮南集解》，望他能觅一部送我。又白。

原载 1979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孔子与中国

尼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殫述，孔子一概摈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语·先进》），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述而》）其对于天道鬼神的态度，见诸论语者：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子疾病，子路请禱。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誦曰：禱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义在以祭享。为治天下之本，故《祭义》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至于鬼神之果有或无，则视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鹄的，以制躬行，至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则非所容心，此孔子之异于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荀子，亦力唱仁义礼乐而不言天鬼，至战国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说，作《中庸》，（《中庸》言华岳，又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这明明是和李斯辈同时代人的口气，决非孟子之前东鲁子思所作。始盛称鬼神之德与天道，于是孔子之面目一变；汉初传，《周易》者，取阴阳家《系辞》归之孔子，大谈其阴阳不测之谓神，大谈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大谈其精气游魂鬼神之情状，大谈其极数知来，极深研几，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中庸》犹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犹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谈其河出图，洛出书，（《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说，大约亦此时窜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纬》有“龙负河图，龟具洛书”之说，可证为阴阳家言。）于是孔子之面目乃再变；董仲舒号为西汉大儒，实是方士，成、哀以后，讖纬大兴，刘氏父子著书，皆兼采儒与阴阳二家之说，班固、许

慎承其谬，于是孔子之面目乃三变；东汉诸帝，笃信讖纬，无耻儒生，靡然从之，白虎观讲议诸人，都是桓谭、王充所讥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论》，广引纬书，侈言三纲、六纪、五行、灾变，可说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谭还公言反讖，几以非圣无法的罪名见诛于光武，郑兴亦不善讖，乃以逊辞仅免，王充著《论衡》力辟神怪，贱儒贾逵以附和讖纬取媚民贼，亦尚言“五经家皆无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到郑玄，他早年师事第五元，本是习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笃信讖纬，博采纬书神怪之言以注《毛诗》、《周礼》、《论语》、《孝经》、《礼记》、《尚书大传》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变；而与阴阳家正式联宗矣。从此贾逵、郑玄之学日显，桓谭、王充之说日微，影响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不为小也。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中国的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虽早已确定，但并不象孔子特别提倡礼教以后的后世那样尊严，特别是君权更不象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三权一体的礼教，虽有它的连环性，尊君却是主要目的。这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各诸侯国中的商业都日渐发达，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属货币（见《周语》及《汉书·食货志》）。郑桓公东迁新郑，与商人立“无强贾”、“毋勺夺”的盟誓（见昭十六年《左传》）。齐擅鱼盐之利，“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见《史记·货殖传》）“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费，千乘之

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见《汉书·食货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见《管子·轻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见《汉书·货殖传》）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经动摇了闭关自给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即孔门的子贡亦“废著（《汉书》作“发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见《史记·货殖传》）是为战国白圭、计然、猗顿之先驱，这便是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势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动摇，遂至诸侯亦日渐陵夷，大夫陪臣挟“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欧洲的中世纪之末，封建陵夷以后，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间曾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 Machiavelli 的君主大权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昭七年《左传》的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所以孔门的礼教即孔门的政治思

想，其内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可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于礼。……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礼记·经解》）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坊记》）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

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礼记·哀公问》，《大戴礼·哀公问》“庶物”作“庶民”）。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礼记·祭统》）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曾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曾子立孝》）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治之也。（《大戴礼·本命》）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大戴礼·本命》）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

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礼记·郊特牲》）

仲尼曰：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不但孔子自己及他的及门弟子是这样，孔子之后，孔子的嫡派大儒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无论对于天鬼，对于礼教，都是孔子的继承者。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已，则王乎？（《孟子·梁惠王》）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

当尧之时，……使契为后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同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荀子·礼论篇》，《大戴礼·礼三本》，

“生之本”作“性之本”，“恶”作“焉”，“无安人”作“无安之人”，后世天地君亲师并祀，即始于此。）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彼君子者（依俞樾说“君”下删“子”字），固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荀子·礼论篇》）

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篇》）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篇》）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杨注云：告，言也；妻者，齐也；天子尊无与二，故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杨注云：适读为敌。《礼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荀子·君子篇》）

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

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门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司马迁谓韩非“归本于黄老”，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尊礼法与反礼法乃是儒法与黄老根本不同的中心点。）孔子是中国的 Machiavelli，也就是韩非、李斯的先驱，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历代民贼每每轻视儒者（例如汉朝的高祖和宣帝），然而仍旧要尊奉孔子，正是因为孔子尊君的礼教是有益于他们的东西，孔子之所以称为万世师表，其原因亦正在此。近世有人见尊君尊父尊夫之弊，而欲为孔子回护者，妄谓“三纲”之说盛倡于宋儒，非孔子之教，而不知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班固纂《白虎通德论》，马融注《论语》，都有“三纲”之说，岂可独罪宋儒，孔子、孟子、荀子虽然未说“三纲”这一名词，而其立教的实质，不是“三纲”是什么呢？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他积极建立起来他所独有的伦理政治学说之体系是什么呢？周末封建动摇，社会的飓风将至，故百家立说，于治世之术都有积极的独特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是黄老的主张；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这是墨家的主张，尚好、好作，这是慎到田骈的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这是惠施、邓析的主张；并耕、尽地力，这是农家的主张；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我向来反对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

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人们倘若因为孔子的学说在现代无价值，遂极力掩盖孔子的本来面目，力将孔子的教义现代化，甚至称孔教为“共和国魂”，这种诬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较之康有为更糊涂百倍。

《周礼·天官大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吏，小吏在乡邑者；《地官大司徒》：联师儒。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是周之儒者，其地位与乡邑小吏同，其专职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贤属师，治属吏，非儒者之事，儒者所教的礼，当然说不上吉、凶、宾、军、嘉全部的礼，不过士民所需凶礼中的丧吊，嘉礼中的昏冠之礼节仪文而已，更说不上治术；若有人把孔门的礼教和孔子以前儒者所教六艺的礼并为一谈，便是天大的错误？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孔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礼记·郊特牲》）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此所谓君子小人，与“小人哉樊须也”之小人同义，彼谓稼圃为小道末艺，非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此谓小人儒为习于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儒，非以礼教治国安民的君子儒。）这正是说礼之义不在礼节仪文之末，君子儒不以六艺多能为贵，所以孔子以后的礼和儒，都有特殊的意义，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

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帝制虽然两次倒台，然而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走狗，却先后昌言民国的大总统就是君，忠于大总统就是忠于君；善哉，善哉！原来中国的共和，是实君共和，还没有做到虚君共和！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人们，竟认为夫妻平等，无伤于君父二纲；美哉，美哉！原来孔子三纲一体的礼教，是可以肢解的！这些新发明，真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才。

孔子的礼教，真能够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吗？就是一班主张尊孔的人们，也未必能作肯定的答复吧！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君臣大伦不可废，无君便是禽兽；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两次推翻帝制，把皇帝赶出皇宫，律以礼教，这当然是犯上作乱；一面犯上作乱，一面又力倡祀孔，这是何等滑稽的事！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身为议员，在国会中大议而特议！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大倡其女权，大倡其男女平等；这不是反了吗！礼教明明告诉我们：“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郊特牲》）然而有些主张尊孔的人，自己竟和寡妇结婚。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馐，既食恒馐。”“非馐莫之敢饮食。”“子事父母，鸡初鸣，……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

敬抑搔之，……枣栗饴蜜以甘之，董、萱、粉、榆、兔、薨，涂
糲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礼记·
内则》）然而主张尊孔的人，都这样孝敬父母吗？非父母舅姑之
馐余不敢饮食吗？有此还要离开父母舅姑组织小家庭哩！礼教
明明告诉我们：“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内则》）“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不杂坐。”（《曲
礼》）然而尊孔的人，能够愿意千百万女工一齐离开工厂，回到
家庭，使之内言不出吗？能禁止男女同学吗？他们宴会时不邀
请女客同席杂坐共食吗？他们岂不常常和女朋友互换名片，社
交公开吗？不但女子出门不蔽面，大家还要恭维学习美人鱼哩！
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礼记》）“非
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
之而后取之。”（《礼记·内则》）然而尊孔的人，不但男女授受
可亲，而且以握手为礼，搂腰跳舞，而且男子生病会请女医诊
脉，女子产儿会请男医收生，孔子若活到现在，看见这些现象，
岂不要气炸了肺吗？这班尊孔的人们，大约嘴里虽不说，心里
却也明白二千年前的孔子礼教，已经不能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
为了，所以只好通融办理；独至一件与他们权威有碍的事，还
是不能通融，还得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班犯上作乱的禽
兽，至于他们自己曾否犯上作乱，这本糊涂帐，一时也就难算
了。孔子的三纲礼教所教训我们的三件事：一是“事君，可贵、
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礼记·表
记》）；一是“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
孝”（《礼记·内则》）；一是“寡妇不夜哭（郑注云：嫌思人
道），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郑注云：嫌媚，略之也，问增

损而已)；“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均见《礼记·坊记》)。今之尊孔者，对于第二第三教训，未必接受，对于第一个教训，到有点正合孤意了，他们之所以尊孔，中心问题即在此；汉之高帝宣帝以及历朝民贼，并不重视儒生，而祀孔典礼，则历久而愈隆，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孔子立教之本身，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此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也。如果孔子永久是万世师表，中国民族将不免万世倒霉，将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认外国统监就是君，忠于统监就是忠于君，那时万世师表的孔子，仍旧是万世师表，“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孔子之徒，只要能过事君的瘾，盗贼夷狄都无所择，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等，正是他们的典型人物。

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提倡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

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碍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

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而不能产生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

原载 1937 年 10 月 1 日《东方杂志》34 卷 18、19 号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朝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

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原载 1937 年 11 月 21 日《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 49 期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一切幻想碰到实际，便对霜雪见了太阳，战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件最实际最严肃的事，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这是多么危险呀！

自对日抗战以来，我们全国上下，拿各种各样幻想的宣传，特别是对于国际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努力。这不独减少了实际战斗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时使一般人失望销沉的种子。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联制裁，《九国公约》制裁等等幻想，事实上已经随着第一期战争失败，而杳无踪影的过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静气毫无成见的洞察国际形势，难免不从旧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长出新的幻想来，以造成第二期作战之不幸，这是我们万万不容忽视的事。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地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

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以上便是目前国际形势之骨干。

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各国预想的军备尚未完成，还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们之间都相互知道彼此的军备同样不充分，只要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是不妨一战的。在此环境中，中国对日抗战，除了向各别国家购得军火外，不能有别的幻想，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们共同对日作战。

人们所谓德、意、日侵略阵线，或法西斯阵线，乃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德、意、日侵略阵线这一个名词，在外延上不合逻辑。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国家，如果说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国家，便等于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德、意、日三国有了《反共协定》，虽然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而还未成为决定对于另一集团的军事同盟，特别是意大利之眼光四射，动摇不定，最近她因为奥国问题和德国暗斗，开始了和英国的谈判。德国虽然承认了“满洲国”，这并非等于宣布今后对于中日战争取消中立。军阀政治的日本还不是法西斯特国家，这乃铁一般的事实。前年法西斯特派政变失败后，受到广田内阁严重的打击，眼前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主力的议会，正在金融托拉斯资助之下，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右派各团体，还在向政府要求释放二月十七日防共护国团包围政、民两党总部之法西斯特派领袖；世界上有这样的法西斯特国家吗？那一个法西斯特

掌握政权的国家能容许别的政党盘据议会，公开的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呢？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会因侵犯别党总部而被捕，而向他们自己的政府要求释放他们自己的领袖呢？如果以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运动的国家，便是法西斯特国家，那么全世界能找得几个非法西斯特国家呢？在法国法西斯特的运动和力量都强大过日本，难道法国也是法西斯特国家吗！所以德、意、日法西斯特阵线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

至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更是子虚乌有之谈。苏联的政制，是独裁而非民主，她和英国始终是貌合神离，英国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表示对苏俄与德、意的斗争两面都不参加；英、法、美虽然同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固守着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欧洲的纷纭漩涡，更谈不上和欧洲任何国家的联合阵线。和平吗？在帝国主义制度未倾覆以前，和平是不可想象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宫的人们，应该懂得这个，因为他们现在还自称为列宁的门徒。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她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于侵略者的和平，她们对于国内人民的反对派（如苏联）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英、法）却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饱受她们这种和平政策的苦教训了；现在中日关系，我们若企图避免战争，而希望和平，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后暂时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说：“如果某些强国不援助日本的对方，远东的和平当已成立了。”如此则和平便是侵略者胜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说法。在呼吁和平避免战争的各国，或者将来也会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她们或者更会进一步压迫中国，牺牲中国，跟在日本后面承认既成的

事实，以维持她们之间的和平。如此则中国便在全世界一片和平声中断送了！呜呼！和平！和平！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国联派所号召的集体安全制度，在伦敦政府心目中的飞鸿，与其说是英、法、美、苏的什么阵线，不如说是英、法、德、意四强协定。这样模糊不定的集体安全制度，经过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事变，又以“不决战不妥协”的态度处之，所谓集体安全制度遂至搁浅。于是包尔温不得不继霍尔而下台，继霍尔的艾登仍旧继续“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张伯伦内阁依然走头无路，直到最近中日战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日见英国在远东的特权与利益朝不保夕，迫得张伯伦不得不于决战或妥协二途选择一个，依避免战争的国策，张伯伦只有选择后者，于是艾登不得不辞职，集体安全制度遂由张伯伦宣告破产。所谓民主阵线，和平阵线，更是由海市蜃楼而幻灭了。照现时国际紧张的局面，“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本来是最无出路的如意算盘，依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霍尔及张伯伦的政策，比包尔温及艾登自较为合理，所以张伯伦一宣称“国联不能为任何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吾人不应再作国联仍能保护弱小国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梦想家所召集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昨日还轰动伦敦，今日便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这班梦想家，受过一九一四年的大教训还不够，现在又受到一个小教训，如果还不觉悟，将终于是一个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辞职的消息初传到中国时，我们的梦想家，还认为张伯伦的外交转变政策不会为内阁及国会所通过，会因此引起政潮；不料事实上，反对派工党在国会提出的谴责政府案，已为张伯伦的长篇激昂演说所驳倒，结果下院卒以三三三票对一六八票而否决了。这是因为张伯伦在演说

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国卷入战争漩涡内乎”一问题，不独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即在我们的梦想家所谓“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热烈反侵略运动的英国劳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因为他们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与张伯伦同调的；剩下的所谓“热烈反侵略运动”只是一句空话而已。除了战争，空话是不能损伤侵略者毫发的。英国的劳工运动，本来是在和平空气中生长起来的，又加以第三国际近几年来和平主义的强调宣传，更是为张伯伦现行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张伯伦的现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协来避免欧洲战争，并且还会和日本妥协来停止远东战争。张伯伦这一政策是应该受人谴责的，然而克里姆宫的人们却不配谴责他。张伯伦虽然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实际政治家，至少不象克里姆宫的蠢材，会幻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能够制止战争，会幻想喊喊反侵略口号，开开反侵略大会，宣传宣传，就能够不动干戈吓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说，“日本的胜利是比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危险要少些。”希特勒可以这样说，英、法、美也还可以这样说，苏联也可以拿这一理由来呼吁和平避免对日战争吗？照英、法、美、苏所力行的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政策，只有让德、意、日本日益壮大，会造成全世界一个更黑暗的时期！在这一点，中国放弃和平，对日抗战，不但有民族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她专门计较自国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口号掩护之下，眼见中国失败而袖手旁观，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谈判，如果在牺牲弱小的条件之下顺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联合干涉远东停战局面，便会到来。我

们万万不可因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认为他们会武装制裁日本，这不独非德、意所愿，亦非英、法所愿；她们干涉的压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还用在中国，使中国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欧洲让步，以阻止日本努力一直南下，完全独占了中国，完全扫荡了英国在中国南方的特权与利益。

如果我们不愿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国的条件，只有努力支持长期抗战之一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能够支持抗战，不再败退，才能够多少转变张伯伦的政策。此时中日两方面都发出长期战争的呼声，其实日本财政虽然比我们优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战争。她的赤字公债，战前已超过一百万万元，二年战争又需用一百万万，如果不能从中国攫取大量金钱，到了明年夏秋间，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汇兑率便难以维持了。财政一露破绽，无论日本军阀如何横蛮，也不能不认真考虑战争应否继续的问题。所以她们已经事先准备拿集会、出版之自由向国民让步，来建立国民总动员的计划，以应付杉山所谓“较目前形势更劣之局面”。我们中国怎样呢？

我们的财政，我们的国民经济，自然更脆弱于日本。我们不能寄托幻想于国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我们更应该拿改良政治向国民让步，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撑持一年以上的战争，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溃。尤其要建立对各级政府的人民监督制度，才真能够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苛税，以扫荡这些破坏国民经济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最大因素。国民经济之崩溃，对于战争的影响，比吃败战更加是致命伤。并且改良政治的实惠，如果真能广及于人民，风声所播，还能以挽回敌人占领地已失将失之人心，使之内向，使之自动的拒绝日货日钞，以加速敌人财政之崩溃。这不都是

目前迫不容缓的事吗？

在怀疑民主政治的人们，或者会反驳我这一提议也是幻想；那么，外来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于自己的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不能拿改良政治来动员财力人力，和安定国民经济，不独战无可战，即忍痛言和，而战后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疮，又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乐观夸大自慰的宣传，经不得事实的打击；“人民愈穷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说！

选自 1938 年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从国际形势
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民 族 野 心

通常说到野心二字，人们便有点厌恶，其实无论个人或民族，野心用在占有欲固然不免令人厌恶，倘用在创造欲上，便是伟大、向上、有志气等同意义的名词。

我们民族现在种种不长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为什么缺少野心？有人说，因为民族衰老了，罗马之后今有意大利，为什么我们却衰老了？有人说，因为孔、孟、老、庄、佛教、宋儒等礼让退婴的学说，衰老了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血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

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而且是更高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这两个社会过渡时期，即前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造成社会的蒙昧无知和散漫，商业造成社会的奸诈和苟偷，于是它的生牢力、武力、道德、文化，都一般的衰落。

欧洲罗马衰亡后数百年，便踏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德川幕府一倾覆，紧接着便是明治维新，两个社会的过渡时期为时不久或几等于无。中国自晚周封建崩溃以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延长了二千年，第一是因为四邻都是些

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因为海岸线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第三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市场，迅速的集累原始资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之继续进展，以此种种，遂至延长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的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然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自然也没有集中的前进的产业工人。这时代的原始农业，各家族占有或使用一块土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只要风调雨顺，便可靠天吃饭；只要家畜和子孙繁殖，使家道兴隆，便是无上幸运；薄税轻刑，是最好的政治，此外用不着人民的组织，用不着国家的保护，用不着政治革命，用不着对外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是商业支配工业，而不是工业支配商业，国内市场已足供其回旋，商人将本求利，固无择于本国制品或外国制品，即令是仇货走私，也一样发财，用不着民族斗争，便谈不上爱国，更厌恶革命战争；他们也和农民一样，根本不会有民族野心。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手工业工人不占重要地位，其特性亦近于农民，乡村的手工业，有许多就是农民的副业。）商人的特性是奸诈和无耻；这两种落后的特性合并起来，便形成了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无短而又无耻，中国二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角色的，也终于是一般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

算是其中优秀分子，这正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之反映，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

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那便万象一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

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又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于是才会有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此次抗日战争发生。然而正因为经济长久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缘故，旧社会的抵抗力过于强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与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资产阶级昏懦的可怜，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了朝野，这便是历次革新运动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

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在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中国现在的银行，仍旧是商业的，而非工业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

不高昂，影响到抗战如此之大，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这都是吃了我们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

（七月十六日）

原载 1938 年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民族野心》

说 老 实 话

“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对于现在的中国人（精卫先生自己和我当然都在内），真是逆耳的良言！

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话的人，决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

说老实话的意义，在表面上好象就是不说谎；然而更进一步解释起来，似乎前者比后者还有积极的意义。不说谎，只是消极的不说谎话欺骗人；说老实话，更是积极的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把真理说出来。在欧洲许多国的语言中，“老实话”和“真理”可以同用一个字，例如英语之 Truth，俄语之 Pravda。

说谎话说出最高的价值，也不过是宗教；宗教是要靠说谎才能存在的，说老实话乃是科学的。科学家有时也有错误，然错误不过若干假定之不成立，真正科学家都不曾有心说谎。科学正是严肃的制止人们说谎，欢喜说谎的人们所以也厌恶科学。

欧美学术界，自从科学战胜了宗教，能够说老实话的人，日多一日。政治界便逊色多了；然而比起我们的士大夫群，还老实得多。譬如：他们的右派便自称是右派，资本主义者便自认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的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如果被人称为右派

和资本主义者，心中便感觉得不愉快，甚至勃然大怒。

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在开会宣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此种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久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信从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

现在的环境并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即偶然吐出万分之一不忍附和时论的话，已经使有些人大大的不快了。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易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七月二十七日

原载 1938 年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资本主义在中国

——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

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之真实性，除了进化论的反对者，已为众人所周知，现在无庸多讲了；至于跳跃的进化，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例如：在古代社会史上，北朝鲜及日本有些地方，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这是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之影响。又如近代史上，俄国因为西欧的影响，由封建的农业国，很快的经过了甚至于可以说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一跃而为近代工业并且踏进了产业托拉斯边缘的国家；在中国，一面继续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一面采用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最新的纺织机器，跳过了英国数世纪的循序进化，所以在上海马路上往往可以看见独轮车和无轨电车及最新式的汽车并行，马拖的公共街车时代则未曾经过。一部分

资本主义的工业之所以在中国有些跳跃的进化，也和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是受了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外来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力量以循序进化的。

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又会引起过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了穷乡僻壤，农村生产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或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国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而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庞大的商业资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之工业化则更加谈不上，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产业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来，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

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

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人们或者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含有缺点与罪恶，我们何不取法乎上，再大的跳跃一下，采用生产力更高的社会主义呢？诚然，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已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中国，便不能说没有跳跃进化之可能；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

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原载 1938 年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民族野心》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而不能恢复，工业也很难发展。在抗战中，工厂被破坏，海口被封锁，更谈不上工业，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主义。如果我们一面高唱抗战建国，一面却因为回避意见纠纷，主张不谈主义，即不谈究竟采用何种主义的经济制来建设工业，那便有点莫名其妙了！

因为铁的事实之教训，即便向来迷信东方精神文化的人们，现在也很少公然反对发展工业，这是中国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发展工业呢？资本主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进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热的希望着解答的问题。对于一般本来头脑不清又怀着成见的半老人，我们值不得跟着他们缠夹，而对于纯洁的青年，却不能放弃指导的责任，不抹杀他们前进的心理，也不因为顾忌他们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迎合他们，欺骗他们，以图拉拢。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

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地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是相同的。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

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

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远在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层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间没收的土地及财产无报酬的分给贫民，而为三级会议所拒绝。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由国会多数党（独立派）分出了约翰李尔波恩所领导的“平均派”，他们的理论家乌伊可吞利主张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消费，废止买卖，废止货币，废止雇佣，政府指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在十八、十九世纪间法国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苏美时派、许伯派及被人称为“疯人”的甲格龙，华来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税及财产税，组织公共作场，把国家一部分财产出租给无产人民，严惩高利贷者，由城市政府廉价售粮食给人民，并且企图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贝夫、达尔脱等组织的“平等社”准备以暴动的手段，来实现平等者的共和国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那是建立劳动者革命专政的政权，主张共和国国民财富之分配，必须用在保证共产主义公社每个社员（即六十岁以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动中，有布南克巴尔比士领导于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张用革命建立独裁政府，实现平等的原则。这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路。这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之历史发展上，资产者、小有产者以及工农平民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产力增高。同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已经由高利资本、商业资本和手工业资本，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当时还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

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沉醉在阻碍生产集中和生产力增高的“均产”、“平等”之幻梦。他们的失败命运，本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们的失败，正是社会之进步，虽然他们的英勇斗争，至今还值得令人钦佩，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巩固，资本主义的罪恶日渐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乃如雨后春笋普遍的发达起来，特别在法国，主要的，如圣西门派、傅立叶派、路易·勃朗派、蒲鲁东派、卡贝派、勃兰克派，一时风靡了欧洲。这些派别，痛恨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当中，除了勃兰克派和以前的巴贝夫一样主张由少数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外，其余都是和平宣传者，希望统治者或慈善的资本家，接受他们的主义主张，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反对工人运动。他们除了做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的社会主义先驱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别国情，来否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

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实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的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跃的进化。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此时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缠夹意见,我们不需要加以讨论。因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更非因为爱好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口中所说和手中所做的是两件东西。我只提出老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够了。马先生的大意是:中国不能走俄国的路,走美国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险;于是马先生感觉得没有出路,仍旧只有提出发展国家工业,同时容私人经营工业而加以节制的主张,这正是罗斯福经济复兴计划的骨干;然而却没有人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马先生也不曾否认资本主义。不过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国,并非美国可比,且以世界大势而论,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来也不会有他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而日夕彷徨为预防将来发财时子孙滥用是谋,这和马先生同样是杞人忧天。并且这一杞忧,便会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意见一样,又要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岂非中国民族活该倒霉!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就

人们所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在别的国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国家工业便以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又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那更是轻浮之见。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原载 1938 年 8 月 24 日《政论》（旬刊）第 1 卷第 23 期

给托洛茨基的信

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之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

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在日军手中，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御线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军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领。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绝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争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溃，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经济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资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

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的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

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的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它出去的。

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了。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国外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

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愈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斯大林派不了解上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新的局势,因此做出许多错误;此次失败后,中国局势的变动更要大过多少倍,更加不能乐观,在今天,我们若不能深刻了解未来可能的政治环境,和明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的力量及其政党的状况,而依次决定实际可能开步走的工作方针,则惟有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

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了的,共产党和国民

党在各农村各小城市所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如果国民党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让一大部分土地给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长江流域某些省份，在这一统治之下，回到反共的旧路是很可能的，这时不但我们，即共产党不改组及变更党名，连半公开的存在都会成为不可能。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和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一九三九年×月

原载《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1949）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作于四川江津

“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子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权、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自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宅试验炸药，这时子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素谈。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国五、六、七年间在北京大学。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了

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

而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先生没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学生，凡是追悼蔡先生的人，都应该服膺他这两点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后，有一位北大旧同学写信嘱我撰一文，备登公祭时特刊之类，并且说：“自五四起，时人间有废弃国粹与道德之议，先生能否于此文开正之。”关于此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

凡是一个象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炉中，各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甚至那一民族灭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还要长。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遭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

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和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譬

如：活焚寡妇，在古代印度视为道德，即重视守节的中国人也未必以为然；寡妇再嫁，在中国视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现时的中国，也算不得什么大不好的事；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战场上能多杀伤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谈；男女平权之说，由西洋传到中国，当然和中国固有的道德即礼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现代的中国绅士们，在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实男子如果实行男女平权，是需要强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至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德尊严的神父牧师坏，清代的朴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原载 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我的根本意见

(一) 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的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动力为条件。

(二) 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

(三) 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和别的居民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的帝国主义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集团之开始。

(四) 应该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武断性，

和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自然性之间的不同。

(五)应该严格区别急进而虚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

(六)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惶投降的后果。

(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问题。

(八)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清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专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十)此次国际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集团互争世界霸权

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辨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用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筋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筋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他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无从谈起。

（十一）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之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军势力必然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量，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

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意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十二)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起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为它算命，如果以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德国国内政变时，斯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统一，在经济上不能够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之束缚（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十三) 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十四) 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够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胜负的因素；即在国

战之价值；廿世纪新式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

(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原载《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1949）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已使世界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拿过去理论公式的表格来填写将来的事变之发展，简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第一种结果之可能最少，我们似不必加以推测，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以何者最大呢？以现状观之，自然以德、日占优胜，开始已两年多了，又因得到苏联出来撑持，英国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时以全力仍不能敌住德国在北非洲之少数部队，若说它能够于最近的将来战胜德国的大军，这是很难想象的事。若认为英国在各战场之失败，都由于陆空军之寡不敌众，再过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军器生产大扩充之后，战局便会转变；惟现时虽有人发出“全面改厂”的呼声，而鉴于过去直至现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误国以及工厂主只顾私人的利益，将来军器生产之竞赛，英、美能否胜过德国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邻邦，确实太成问题。即假定将来可以胜过，又有何神秘能够使希特勒及其伙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内，按兵不动，静候着英、美扩充军备呢？德国的内部危机，诚然大过英、美，然在对外战疲或溃败前未必

爆发。德国唯一的弱点是缺乏煤油，这也只是她在始终无力夺取高加索或伊朗的条件之下不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因素。基于各种情势，德国利于速战速决，英、美则利于持久战，双方都以争取时间为第一要着；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国的春季攻势，无论发生在地中海或欧俄大陆、马耳他、直布罗陀、苏伊士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或莫斯科、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都可说是决定此次大战全局胜败之最大关键，这一战线之胜利若属于德、意、日，英、美是不能够长久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单是地大人众物博，并不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

倘胜利属于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会中，或国际善后会议中，便开始形成对立的局面，战后英国收拾欧洲、北非洲、近东以至中东，已非易事，一时决无力量及于远东，远东以至南洋、澳洲，自然会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那时苏俄将是两方面拉拢的奇货，英、美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胜利倘属于希特勒，英国便完了，美国也只得暂时划两洋以自保。希特勒虽胜利，他的枪口仍然要向着西方，自乌拉山、伊朗、印度以东，则非他的军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时无论美、日是否成立和议，日本将是美、德两方面拉拢的奇货。美国固未必继续对日战争，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他也不会为了远东问题开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转向美国，自断其两洋夹攻美国之右肋，希特勒知道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消灭后，他若威胁日本，日本有获得美国退出远东的条件而和美国协助之可能。美、德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世界还会有几次大战，我们还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战争的因未除去以前，战争的果是不能免的，并且胜利若属

于德国，下次战争必然来得更快。美、德间固然虽无所谓和议，而实际战斗并必告一段落，德国固然需要一停战时期，建立他的新秩序以收胜利之果，更需要补充足够渡美的战舰及运输舰之时间，然一过此时期，德国对美战争便会从南美洲开始。本来每次国际大战都不过是前次大战之继续延长，我们切不可为“永保和平”、“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资本制度消灭”，如此等等好听的宣传所眩惑，梦想战后这些都会实现。

欧美人想就资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图，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结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边，巍然起来了脱拉斯；在劳动立法普遍了半个世界之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得恢复计件工资。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更不能够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松。此次大战后，不但英、美，就是在德、意、日的世界里，也必然企图改良资本制度，以适应他们的统治，希特勒一向非难资本主义，这并不能够欺骗任何人，只是他和他自己开玩笑。他们改良的企图，不外拿关税协定甚至经济同盟，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关税壁垒；拿物物交易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货币作用；拿产业国有化，来代替某些私人的企业。各集团圈内关税壁垒即能减轻，对于另一集团圈的关税壁垒势必还要加强；物物交易的办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交易的，仍旧以货币计算，仍旧以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种产业国有，已经是前世纪所有的事，全部国有化，即实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好似说得通，而事实上必不可能。占有生产工具的大集团，不经过革命的没收，而自愿的把私有财产贡献给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个超然政府来和平的没收，这一所谓“超然政府”，上午企图没收别人的企业，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别人没收了。所以以上三

种改良企图，决不能动摇资本制度的基础。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她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国的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私有财产制和商品生产制，是资本制度之基础，亦即其弊害之根源。这一生产制，其目的是为拥有生产工具者出卖商品，增加其私有财富而生产，不是为直接供给一切人民食品而生产；其生产力愈益发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产力与购买力之均衡，因之，而生产过剩，而物价低落，而工厂倒闭，而工人失业，而形成经济恐慌；经过一时期，因生产力削弱而恢复原状，后又因生产力比以前更加强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环而构成恐慌之周期律。自来救济生产过剩之策有二：一是自动的减少生产量甚至毁坏生产品这一愚蠢可笑的办法；一是争夺殖民地及国外市场走向战争这一疯狂可怖的办法。为了必须把国内生产过剩的商品向国外市场推销，还必须阻止国外商品侵入国内市场，就不得不加高关税壁垒，扩张军备，准备战争，以至实行战争。这一串因果相联的现象，都是现在国家当局所必须采用的步骤。因为他们既不能消灭资本制度，便只得让资本制度牵着鼻子走，否则只有失败，这本是事实之必然，决不是什么思想，什么良心所能使之改变的。在全世界几个强大国家必须争夺市场，必须准备战争，必须实行战争的时代，大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彼此挤得水泄不通，怎样谈得上民族自决、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战之终了，威尔逊的十四条，未尝不轰动全球，而随即销声匿迹者，并非路易乔治和克利蒙梭欺骗了威尔逊，乃是威尔逊欺骗了他自己，并且这一欺骗，亡了法国，害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丧失了强国的体面。此次大

战后，谁还要在资本制度世界标榜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下次大战中，谁就是失败者。

此次大战后，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都仍旧不变吗？资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自动的根本放弃，但统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变，即是：由民族化到国际集团化这一形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并非帝国主义制度之终结，而它反走向扩大与加强。今后不但十九世纪以前的民族国家运动已随着帝国主义发生而没落，即二十世纪初期的七八个帝国主义列强之对立也要完结。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国家进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之较幼者，日本是最后一个，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市场都已为他人捷足先得，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疯狂的以战争来改变帝国主义世界旧秩序之唯一原因。战争的结果，真正完全独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两个领导国之对立，美、德之对立，或英、美之对立，其他国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义之下，分别隶属于这两个领导国所领导的集团圈之内。日本和苏俄，当然都有各自领导其集团圈之野心，然而生产力终于要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他殖民地及落后国，若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新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各集团圈内，依国力之强弱，其地位略分四等，第一等是较有面子的所谓“同盟国”，例如日本之于德国，苏俄之于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意大利之于德国，荷兰、法、比之于英、美，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经济，都多少要受领导国支配；第三等国是被保护国，例如法、比之于德国，丹麦、意大利之于英国，菲律宾之于美国，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独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连自治政府也没有，统治权操诸领导国总督之手。比

殖民地更次一等，自来是没有的，有之便是种族日渐消灭之美洲、澳洲的土人。各集团圈内的国家民族地位虽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他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着领导国的模样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国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都要按着纳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也要按着民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呢？这要靠着领导国的革命成功才能实现，才能够影响整个集团圈，依俄国革命的经验，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弱的一环之破碎，终于不能够使它全部瓦解。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她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有些欢喜做梦的人，当此次大战一开始，便梦想弱小民族独立的机会到了；其实亚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国便入了德、意的掌握。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胜悲哀，如果再觉得今后连民族斗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纳粹党会支配半个地球，他们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坠落到悲哀的深渊，将感觉着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的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此次大战，即使不幸得很，胜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而在这经济和英、美胜利一样，固然不能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而资本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渐次减少世界上许多小的经济单位，除去一部份经济发展之障碍，将比战前

的社会生产力要突飞猛进，这是在客观上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资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只有眼光狭隘的教派之人，才见不出这一远景。人类历史也和地球一样，无论在光明的白昼或黑暗的深夜都是进行不息的。

正经的说来，认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何况在两派帝国主义的主脑，争着以战争状况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只有欢喜幻想的人听着才觉得惊异，如果从世界经济由统一而进步的观点看来，民族斗争受到限制，不一定完全是很坏的事。无论是全世界或一个国家以内，没有革命的统一，反革命的统一也有进步的意义。例如吴佩孚的统一比军阀割据好，刘湘的统一比防区时代好。并且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并不是说被人领导的民族将驯羊似的一无所作为，只是今后的民族斗争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有此警觉才能够开始实行有效的步骤：（一）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以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现在已经不是李鸿章时代，不应仍做富国强兵一跃而为十八、十九世纪式民族独立国家及二十世纪式世界头等国的好梦；（二）创造自己的实力（工业及民族的组织），以准备与领导国内革命相应和的斗争，以达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进步，不应幻想关起门来，在一个国家以一个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实现民族资本主义的国家之独立；（三）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

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国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若仍旧由民族立场出发而斗争，印度眼前的敌人便是英国，中国将来也要再来一次抗美战争；(四)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该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诚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过当，便会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视一切，形成偏畸的发展，竟把民生国防所依赖而应该特别重视的物质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还有人竟把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光荣，印刷与火药之发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缩小在文艺圈子里，这样误解文化的结果，遂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发生了万分不应该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把口里哼哼诗词、手里耍耍笔杆，应该称为“文人”的，无端改称为“文化人”，这和日本称中国为“文字国”同样是对中国文化之讽刺，一是继续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挡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

或者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轴心和非轴心两派帝国主义各自扩大其势力圈之斗争，非民族解放之斗争，弱小民族之参加毫无意义。这一见解是由于他们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够依赖帝国主义帮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中立”这一名词，现在战争史上将不会再见了。缅甸人如果说：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而不能和不认识的天使来往；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并不知道现世界有甚么天使，只

知道你们所谓认识的魔鬼，比你们不认识的魔鬼，还要凶恶十倍！中国如果有人说：帮美国打日本，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我们应该告诉他：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

以上的说话，或者有人认为是低调，那只好让将来的事实教训他。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重庆《大公报》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

被压迫的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都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

但是这一斗争若是限制在民族范围以内，其前途如何呢？

第一，自国内言之，活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对于民族落后性，不但不能减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因此向后转且不论，单就经济而言，在持久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封锁及通货膨胀，因为没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组织又薄弱，很容易为贪官、奸商和地主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财之千载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受饥寒困苦，你若主张用不很和平的手段去掉这种现象，便有人大喊：这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破坏了一致对外的民族阵线；并且实际也真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然而这种现象

不去掉，正是民族战争的致命伤，而又不是宣传劝告或政府一纸禁令所能去掉的，这便怎样办？

第二，自国际言之，在各派帝国主义互相争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场极端尖锐化的今天，甘地认为一民族不能依赖强国的帮助而得到自由，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没有别的强国的帮助，也不能脱离眼前的强国之压迫；并且有些强国不管你依赖不依赖它会强来帮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于是尼赫鲁没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张拒绝美国之帮助，美国势力如进了印度，我们知道它对于殖民地的态度，不但好过德意日，并且好过英国，菲律宾便是榜样，然而菲律宾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这理由当然十分正当）排去英国势力，另换一个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鲁无论如何强调宣言印度受外人压迫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们内心也未必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真能赶走英国，同时又击退日本和德国；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继续执行不合作运动而已。这又怎样办？

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对于我这一见解，或者有人提出两种驳论：一是说，落后民族如何谈得上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够和别国的劳动者及别的

弱小民族结合在一起？一是说，社会主义是否包含民族解放问题？

提出第一种驳论的人，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可，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法，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之开始。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即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之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互相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压迫者大结合，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提出第二种驳论的人，是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弄迷惑了，第二国际只企图在资本统制之下，从事改良运动，所以不曾计及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

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外国把帝俄时代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如果有人根据近来苏联对于日本战争及此次大战之初对于波兰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怀疑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联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了社会主义！假使俄国仍旧艰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它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这就是说，不应该和英美同样站在事外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它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拚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日本便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它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战到今

天，日本便无力横行西南，蹂躏菲律宾、马来、爪哇、缅甸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当纳粹军队进攻波兰时，苏联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火中取栗，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这时英法比联军还未崩溃，希特勒并未认为能够在东西两战场同时得到胜利，孤立的波兰失败后，东战场没有问题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击败英法比联军，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这一大群小国！

单就俄国前后立场不同其结果也不同这一串历史故事，已足够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了！

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它的民族政策之后果如何？它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其结果俄德战争不开始于希特勒在欧洲孤立之时，而开始于希特勒击败了欧洲各国之后。俄国不但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之代价使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洲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若没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它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连中国共产党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击”的恶名；其结果，明天日本仍会协同希特勒夹攻俄国，陷俄国民族于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时将不能得到中国有力的声援，因为它已坐视中国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原载《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1949）。

陈独秀著作年表

杨子江形势论略

1887年冬刻本

安徽爱国会演说

1903年5月26日《苏报》

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第1期

说国家

1904年6月14日《安徽俗话报》第5期

亡国篇

1904年7月27日—1905年6月3日《安徽俗话报》第8、9、10、13、15、17、19期

中国兵魂录

1904年10月23日—1905年5月《安徽俗话报》第14、17、18期

诗七首

1914年8月10日《甲寅》1卷3号

爱国心与自觉心

1914年11月10日《甲寅》1卷4号

敬告青年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1卷1号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1卷1号

今日之教育方针

1915年10月15日《新青年》1卷2号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

1915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新青年》1卷3号4号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1915年12月15日《新青年》1卷4号

一九一六年

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1卷5号

吾人最后之觉悟

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1卷6号

答辉迂（卫生与遗传）

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1卷6号

致胡适

写于1916年8月13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新青年

1916年9月1日《新青年》2卷1号

我之爱国主义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2卷2号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2卷2号

宪法与孔教

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2卷3号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2卷4号

袁世凯复活

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2卷4号

答毕云程

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2卷4号

答王统照

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2卷4号

再论孔教问题

-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
答吴义陵（孔教）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
答褚葆衡（社会主义）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
致胡适
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文学革命论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
答叶挺（道德、宇宙和科学）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
答钱玄同（文学革命）
1917年3月1日《新青年》3卷1号
答蔡元培（宗教）
1917年3月1日《新青年》3卷1号
答淮山逸民（道德）
1917年3月1日《新青年》3卷1号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3卷2号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为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作后记
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答俞颂华（孔教）
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答胡子承（思想革新）
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
感怀二十首
1917年5月《丙辰》第3期

近代西洋教育

1917年7月1日《新青年》3卷5号

政局之根本解决

1917年7月4日《中华新报》

答陶孟和（世界语）

1917年8月1日《新青年》3卷6号

科学与基督教

《新青年》3卷6号至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

人生真义

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4卷2号

驳康有为《共和平议》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

有鬼篇质疑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

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5卷1号

学术独立

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5卷1号

偶像破坏论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

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5卷3号

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

1918年9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

克林德碑

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

李超女士悼会之演说词

1918年12月3日《晨报》

《每周评论》发刊词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1号

- 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1918年12月29日《每周评论》2号
-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
- 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
- 除三害
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5号
-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6卷2号
- 旧党的罪恶
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11号
- 人种差别待遇问题
1919年3月9日《每周评论》12号
- 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1919年3月16日《每周评论》13号
- 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
1919年3月23日《每周评论》14号
- 贫民的苦声
1919年4月27日《每周评论》19号
- 孔教研究
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20号
-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25号
- 研究室与监狱
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25号
- 北京市民宣言
1919年6月14日《民国日报》
- 论“的”字的用法
1919年11月22日《晨报》
- 为潘力山著《论新旧》附识

-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新青年》宣言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法律与言论自由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调和论与旧道德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留学生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实行民治的基础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
1920年1月1日《新青年》7卷2号
新教育的精神
1920年2月9日《国民新报》
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1920年3月1日《新青年》7卷4号
致周启明
写于1920年3月1日载1979年5月15日《历史研究》第5期
教育缺点
1920年3月30日至4月1日上海《时报》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1920年4月1日《新青年》7卷5号
现代教育的弊病
1920年4月2日《时事新报》
陈独秀最近之演说
1920年4月22日《时事新报》
致李大钊、胡适等
写于1920年4月26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劳动者的觉悟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

《水浒》新叙

1920年7月7日上海亚东图书馆新版《水浒》

谈政治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8卷1号

对于时局的我见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8卷1号

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8卷3号

答柯庆施（劳动专政）

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8卷3号

《共产党》月刊短言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1号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

主义与努力

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

提高与普及

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

新教育是什么

1921年1月3日《广东群报》

社会主义批评

1921年1月19日《广东群报》

讨论社会实际问题

1921年2月14日—2月19日《广东群报》

《红楼梦》新叙

1921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新版《红楼梦》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1921年5月1日《新青年》9卷1号

告劳动

1921年6月7日《共产党》第5号

卑之无甚高论

- 1921年7月1日《新青年》9卷3号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1921年7月1日《新青年》9卷3号
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1921年8月1日《新青年》9卷4号
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
1922年4月12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告作劳动运动的人
1922年5月1日《先驱》7号
做旧诗
1922年5月3日《广东群报》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
1922年6月《东方杂志》19卷15号
马克思学说
1922年7月1日《新青年》9卷6号
《陈独秀文存》自序
1922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陈独秀文存》
平民教育
1922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陈独秀文存》
革命与反革命
1923年1月18日《向导》16期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
1923年1月31日《向导》18期
为自由而战
1923年2月7日《向导》19期
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1923年4月25日《向导》22期
中国农民问题
1923年7月1日《前锋》创刊号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1期

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

1923年10月27日《中国青年》2期

苏俄六周

1923年11月7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科学与人生观》序

1923年11月13日《新青年》季刊2期

安徽学界之奋斗

1923年11月16日《向导》46期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1923年12月1日《前锋》2期

精神生活东方文化

1924年2月1日《前锋》3期

国学

1924年2月1日《前锋》3期

列宁之死

1924年2月2日《中国青年》16期

评中俄协定

1924年3月26日《向导》58期

上海租界三大问题

1924年4月16日《向导》61期

泰戈尔与东方文化

1924年4月18日《中国青年》27期

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

1924年5月28日《向导》67期

留美学生

1924年8月6日《向导》77期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1924年9月3日《向导》81期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1924年10月8日《向导》86期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1924年10月29日《向导》89期
列宁与中国
1925年1月21日《向导》99期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
1925年2月21日《向导》103期
悼孙中山先生
1925年3月14日《向导》106期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
1925年4月22日《新青年》1号季刊
《圣经》与鸦片
1925年5月10日《向导》114期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
1926年3月17日《向导》146期
革命的上海
1926年6月30日《向导》160期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1926年7月25日《新青年》季刊5号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1926年9月25日《向导》172期
我们现在怎样争斗？
1926年10月12日《向导》175期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1926年10月12日《向导》175期
十月革命与东方
1926年11月15日《向导》178期
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
1927年2月16日《向导》188期
我们目前的奋斗
1927年3月6日《向导》190期

我的妇女解放观

1927年3月8日《三八国际妇女纪念》

移步换形的骗术

1927年12月5日《布尔塞维克》7期

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29年单行本

告全党同志书

1929年12月10日《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无产者》发刊宣言

1930年3月1日《无产者》1期

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1930年3月1日《无产者》1期

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1930年7月1日《无产者》2期

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1930年11月10日《无产者》5期

为国民会议运动告民众书

1930年12月《无产者》7期

国际路线与中国党

1931年2月1日《无产者》10期

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1931年2月《无产者》11期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1931年3月15日《无产者》12期

我们争论之中心点

1931年11月7日《火花》1卷5期

两个路线

1931年11月23日《校内生活》1期

评工农民主专政

- 1931年12月26日《火花》1卷7期
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1932年1月23日《热潮》7期
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
1932年4月16日《火花》1卷9期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
1932年11月17日《先锋》5期
致胡适
写于1932年12月1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辩“诉状”
1933年2月20日单行本
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
1933年11月23日《校内生活》7期
我们走哪条路
1934年1月16日《国民会议与苏维埃》
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
1934年5月12日《国民会议与苏维埃》
金粉泪（诗56首）
1934年手稿
现局势我们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
1935年1月10日《肃清机会主义》
致胡适
写于1935年2月14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中国的一日
1936年9月《中国的一日》第二编
甲戌随笔
1936年手稿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
1936年手稿
实庵字说及其它
1936年手稿

老子考略

1937年6月1日《东方杂志》34卷11号

孔子与中国

1937年10月1日《东方杂志》34卷18、19号

抗日战争之意义

写于1937年10月6日、载《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单行本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1937年12月21日《宇宙风》49期

实庵自传

1938年3月《宇宙风》51、52、53期

抗战与建国

1938年4月25日《政论》1卷9期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1938年4月《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期

民族野心

1938年7月16日《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资本主义在中国

1938年7月16日《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说老实话

1938年7月27日《告日本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1938年9月15日《政论》1卷23期

给托洛茨基的信

1939年3月写，载《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

给西流等的三封信

写于1940年3月，载《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我的根本意见

写于1940年11月28日，载《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

禹治丸河考

1941年1月16日《东方杂志》38卷2号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写于1942年5月13日，载《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

给Y的信

写于1942年5月13日，载《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